

中共党史资料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
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耀邦同志在湘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59

1996年9月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责任编辑:傅 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59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9

ISBN 7-80023-985-3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305 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59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60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985-3/K·905

定 价:6.00 元

目 录

长征回忆录

- 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 孙 毅(1)
红色上干队 莫文骅(10)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方 强(16)
在长征中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王永濬(24)

专题资料

-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
发表 赵俊清(33)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 熊向晖(44)
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郑 谦(89)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123)

人物介绍

- 耀邦同志在湘潭 唐 非(149)

年 谱

高君宇年谱 张思荣(160)

信 息 窗

《知青日记选编》、《知青书信选编》的
史料价值 史卫民(189)

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

孙 毅

紧急组建

1934年7月中旬，我从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又回到瑞金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房内备课，突然校办派人通知我，说原红军学校校长、现任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请我马上去一趟。我放下手中的教案，顾不得多想，快步赶到位于沙洲坝的军委总部。

叶副参谋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应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中央决定尽快组建一支部队——教导师。”他接着说：“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人员要严格挑选，并要经过正规训练，使之成为一支政治上、军事上合格的部队。”“关于教导师的干部，军委已经确定：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嘛，伯承同志指名叫你担任，我完全同意。今天请你来，是正式通知你的，看你有什么意见？”

我从事部队管理教育工作多年，心里非常清楚，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何况是两位老校长对自己如此信任。我郑重地说：“坚决服从命令！”

叶剑英微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报到，张经武已到任 20 多天了，他和三个参谋、一个特派员在那里筹建，忙得不可开交。”

教导师的驻地，选在瑞金城西 19 公里高围村附近的刘陈村。高围是个大庄子，由 7 个自然村组成，不远处的云石山，树木繁茂，风景宜人。不久前，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沙洲坝迁到这里，毛泽东、张闻天就在云石山上祠堂里办公和居住。

刘陈村，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庄。我身背背包，一进村看到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一打听才得知，村里的男青年都参加红军去了。是一位 12 岁的小姑娘给我带路找到师部的。

在村中一座青砖高墙的大院里，我见到师长张经武。他向我简要介绍了教导师目前的组建情况。

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并保障其安全。有关警卫的业务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领导。为此，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自领导教导师组建。他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各方面的困难，8 月底完成组建，9 月初开训。

已任命的政治委员何长工，此时还在粤赣军区担任司令员，尚未到职。师部司、政、后机关已初具规模。

我来到司令部值班室，见到作战科长陈奇涵和侦察科长毕士梯。陈奇涵对我说：“咱们司令部的工作从零开始，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管理科已搭起了架子，并开始运转。”

坐在一旁的毕士梯说：“让我负责供给部、卫生处的

组建，8月底完成任务。”

当时，师政治部主任李熙还未到任，由组织科长刘汉、宣传科长段德彰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我和张经武则集中力量组建部队。在几天之内，地处闽赣地区的瑞金、会昌、兴国、汀州、宁都、于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补训团和游击队的成员，成群结队前来报到。

教导师编为3个团，每团1700人，加上师部各直属队，全师共6000余人。这些来自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们，年纪大都在17岁至22岁之间，个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昂。我看到这样一支崭新的队伍，心中充满了喜悦。

8月底，军委从前线调来十几名团职干部，还带来几十匹骡子，从此，教导师组建完毕。教导师正式成立后，立即投入严格而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为日后艰巨的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告 别 瑞 金

1934年秋天，红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中央苏区根据地也日益缩小。在苏区内，军民吃盐、穿衣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10月7日下午，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乘马来教导师。我和政治部主任李熙赶到村头迎接。在司令部办公室，刘总长压抑着内心的忧虑，镇静地说：“我现在向大家传达中央军委有关红军突围的决定。”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宣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屋子里很静，在场的人都不敢随意插话，空气好似凝

固了一般。

宣布命令后，刘总长抬头环视一番，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一年，从军事上说，我军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不好再展开大兵团作战，也不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怎么办？”刘伯承压低嗓门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8万多人，由中央军委率领突出苏区，打到蒋管区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刘总长看了看张经武和我，然后又说：“你们教导师还有一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协助中央机关搬运武器、物资，部队要准备负重行军，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要认真做好。”

8日上午，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来到教导师检查工作，我陪他到3个团都看了看。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孙毅，部队即将大转移，你们师又都是新战士，他们的思想一定会有波动，甚至会听到一些谣传。你同李熙同志商量一下，如何做好战士们的工作，坚定部队战斗意志，减少逃亡。”我点点头说：“叶副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10月10日，教导师开始出征。

下午4时，军号声声，教导师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向高围村沙丘一带集合。战士们把五六百担东西，包括用稻草捆绑的三五个人或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的机器部件，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等，暂时隐蔽在集合场外百米处的丛林里。

乡亲们看到这些既无汽车运输、又不用骡马驮载的

笨重军用物品，由自己的亲人以及红军战士背着、挑着、抬着去行军、打仗而惊奇和担忧。有人质问，为什么行军、打仗还搬运这么多东西呢？战士成了驮马还能战斗吗？

可是红军战士们坚定地回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再多再重的东西也能把它运走！”

教导师就要出发了，利用沙丘高地当会场，我整理队形，李熙主持会议，张经武讲话，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感谢瑞金地方干部、父老兄弟的热情欢送。

出发号声响了，我宣布行军序列：一团在前，二团随后，三团后卫，师直属队随二团行进。宣布完毕，教导师指战员上路了。

部队已经走出 2 里路了，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难舍难分、拥挤着、流着泪，跟随队伍前进。

走在队伍末尾的我，面对此情此景，情绪激奋。我掏出手巾，擦掉眼角的泪花，匆匆几步，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说：“乡亲们回去吧，不要再送啦！总有一天我们还要打回来的！”我使劲举起双手，向乡亲们告别。

甩掉包袱 轻装前进

教导师经过四个晚上的夜行军，进入敌军控制的赣县、信丰、安远边界，这里即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部队在信丰休息时，政委何长工由粤赣军区赶来教导师上任。

在行军途中，我负责观察部队行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我还必须要办三件事：一是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二是绘制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

令”；三是写出宿营报告，派专人送达上级司令部。

然而一路上，对我来说困难最大的是二排长他们十几个人抬的那个机器部件。有时遇一个大坡，几个小时都上不去，弄得战士们疲惫不堪。在通过大瘦山时，第一团团团长文年生亲临现场指挥。因为大雨过后，道路泥泞，坡陡无法通过，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才继续攀登。二排长他们用绳子拴在机器部件上，前拉后推，用了一个多小时，才闯过几十米高的峭壁。

在前方的一个路口，我等候掉队的文团长和二排长。二排长小声对我说：“抬着这么多笨重的机器干什么，将来仗打赢了，占了大城市，还缺这修枪炮的机器吗？那些印票子的石印机其实就是好多块大石头……”

我说：“你不要说啦，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呀！”

随后二排长站在山岗上稍一定神，突然冒出来一句：“这些笨玩艺，扔掉算啦！”

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着教导师的行军速度，当然也关系到中央红军纵队西进的战略部署。

一天晚上宿营后，教导师的几位主要领导——张师长、何政委、我和李主任在一起研讨近期行军小结，我把二排长的反映一一转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何长工政委说：“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发电报，说明抬运机器掉队的人跟上了主力，并请求上级批准，今后再遇危险道路时，把十乘个人抬的机器部件，炸毁后丢进山涧里，以保证部队人员免遭伤亡。”

电报发出后，第二天接到军委总部复电“同意教导师的建议”。

教导师进入广东乌径后，接到刘总长布置的战斗任务，接替红一军团向南雄、水口方面担负的警戒任务，要求在该阵地坚守一天一夜，不准敌人前进一步，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第2道封锁线。

师长、政委和我亲临第一团，和团长文年生共同研定作战方案。文团长于下午4时，几次带领部队向尾追之敌反冲锋。黄昏时分，一团战士和敌人在前沿阵地白刃格斗，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受到刘总长的表彰。

接着浩浩荡荡的教导师，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半天才向上爬几百米。

面临严峻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师长、政委找我紧急商量，决定把两人和十几个人抬着的机器全部处理掉，扔到大山沟里。

此决定传达后，战士们拍手叫好。当即打开用草包、草绳、麻袋包裹的那些无法砸碎的修枪炮的机器、印票子的石印机、大型车床……顺山势往下推，滚动的机器部件隆隆作响。

上百个大件处理后，1000多战士从沉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了。但剩余的400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教导师战士挑着前进。

11月初，教导师通过敌军沿粤汉铁路线所设置的第3道封锁线。经湖南的宜章，跨越香花岭，继续向西挺进。

根据军委朱德主席的紧急命令，教导师全速前进，于12月1日渡过敌军设在湘江的第4道封锁线，经广西北部资源县，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方向进发。

途中，部队要越过2000米高的老山界，这里山高路险，行走困难。不少人在老山界上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身子一歪，倒下去就断绝声息。

两个月的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失去了战斗力。当翻过老山界之后，教导师6000人只剩下一半。

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东部边城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议放弃北进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决定刘伯承重回军委总部，担任总参谋长；撤销红八军团、教导师、保卫团的建制，原中央纵队的一、二纵队合编为1个纵队；教导师所剩3000人，编入一军团、三军团各一半，战士所挑的400多担“坛坛罐罐”，全部破坏，丢弃在偏僻大山沟和河流里，不致落入敌人之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并安排教导师有关撤销方面的若干事项。刘总长宣布：“张经武调军委分配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红军学校干部团任职；李熙去总政组织部报到；裴周玉去国家政治保卫局……”

教导师行至黔东施秉县境时，召开了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传达了中央黎平会议精神。

1935年1月5日，是教导师通过乌江的日子。这一

天,教导师要在乌江两岸处理最后一批机器零件,这天天还没亮,我同张师长和何政委就赶到了乌江渡口,等待部队到来。当战士们一字排开,将所剩的 100 余担机器部件一件件投入乌江时,江中顿时发出辟辟叭叭的响声。处理完毕后,部队拉开距离,顺利通过乌江浮桥,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仝玉林 整理)

红色上干队

莫文骅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战斗序列里，有支特殊的队伍——中革军委上级干部队，也称红色上干队。

该队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夕，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学员共130多人，均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上干队属中革军委建制，由红军干部团指挥。当时上干队的队长是萧劲光，政委余泽鸿。1935年2月，由于红八军团撤销，原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长的我，被派到军委上级干部队任政治委员，于云南扎西到职。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科长苏进）、地方工作科（科长冯达飞）等三个科。其中政治教员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5位老同志。他们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至于上干队的学员，则都是团、营军事、政治或地方县级干部。

上干队同志的革命意志特别坚强。有些同志过去曾是统领千军的红军将领，有的曾是身居高位的领导，现在都当了普通战斗员，自己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但他们没有一个示弱的。还有的同志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但他们的意志没有消沉。我们上干队支部也特别地信任他们，并注意发挥他们的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董老等 5 位政治教员，年纪大，身体弱，又无马骑，每人拿着一根自己做的手杖走路，平时行军走在中间，有情况时，随伙食担走。当时我们真怕他们出事。而这 5 位老同志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利用休息或宿营时给学员们上政治课。有时敌机轰炸过后，他们边拍拍身上的泥土，边开玩笑地说：“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有一天，部队在贵州行军时，因山路难走，大家相互间的距离越拉越长。这 5 位同志拄着棍边走边聊，没有注意路标，走错了路。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发现少了他们 5 位，收容队也说没有见到。大家急得满头是汗，马上向军委报告。周恩来副主席很着急立即发电报指示各军团帮助寻找。直到半夜，接军委来电，说他们已走到红一军团那里，我们悬在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第二天，一军团派人护送他们回来，大家非常高兴。

长征途中，尽管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受尽磨难，但革命意志没有垮，上干队 100 多名同志除个别同志牺牲外，大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旅程，胜利到达目的地。

上干队虽不是战斗部队，但队员们大都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因而特别能战斗。1935 年 2 月下旬，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在二渡赤水后，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溃逃，一、三军团继续东进，向遵义方向追击敌人。接着，中革军委纵队也向遵义开进，唯有上级干部队奉命被留在桐梓城，其任务是担任警戒，等九军团来接防

后再向遵义归队。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而我队只有百多人，几十条枪，上级暂拨一个警卫连归我们指挥。

桐梓是贵州较大的县城之一，人口上万，商业也比较繁华。我们守不过来，只好把警卫连放在城西，向西警戒；指挥科学员放在南边城外，向南警戒；东北方向接近娄山关天险，没有派部队警戒。队部还有政治工作科 30 多人，地方工作科除一部学员去做群众工作外，尚有 20 人左右，其余就是伙食担子。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下午 4 时左右，从北边和南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立即告诉萧队长，迅速把队伍集合起来。正在这时，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军团直属队由南边开进县城。我和萧队长将敌情和我们的任务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听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接防。”我看他们带入城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直属队，便问：“你们的队伍？”罗炳辉回答说：“还有两个团在后边。”这样，我便和萧队长率上干队奔向娄山关。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快接近娄山关时，忽然，从桐梓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们回头一看，见不远处罗炳辉等率九军团直属队向我们这里奔来，后边有敌人在紧追。罗军团长个子高，身体较胖，穿着一双布鞋，走路比较慢，两个警卫员搀扶着他。他的手枪队也在后边护卫抵抗。敌人越来越近，大声吆喊道：“抓活的！”我感到形势危急，立即同萧队长一起指挥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过来。我对他说：“关口由我们

把守,你先走吧!”

原来,罗炳辉和蔡树藩率军团直属队到达桐梓不久,其后面两个主力团已绕过娄山关直接向遵义方向开进,他也接到军委通知,要他立即撤离桐梓,赶到遵义。但他率直属队出发将接近娄山关的路上,碰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过来,咬住他们不放。若不是遇到我们,其处境是不堪设想的。

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地把敌人阻击在娄山关脚下。那时,原军团一级的队长,作为连长用了;原军师一级的科长,作为排长用了;原是团营一级的干部,作为列兵用了!有枪的学员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没有枪的学员便拿起棍棒和石头,迎击敌人。敌人见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停止了进攻。这时,中革军委派五军团一个营来接防,并告诉我们,红军主力在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家听了非常高兴,精神振奋。交接完后,我们向遵义前进。

娄山关距遵义约 90 华里,我们于黄昏前赶到遵义城,归还中革军委建制。

当晚,萧队长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娄山关阻敌情况,周副主席听后赞扬我们阻击得好,并给我们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准备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以保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准备。

当时,红军主力部队正在鲁班场与敌周浑元作战,中革军委离北面的仁怀县城只有 30 华里,而驻地除警卫部队外,再没有战斗部队了。仁怀县城有多少敌人,尚不清楚,如果敌人向我首脑机关袭击,那就麻烦了。因我队

在桐梓与敌较量中,显示了战斗力,故中革军委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队,拨一个工兵连归我们指挥。

过了几天,我军通讯部门获悉:仁怀县城的守敌只有一个连,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这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当晚,我和萧队长带领我队和工兵连悄悄直奔仁怀县城。因为夜袭,我们不敢点火,也不能出声,走的是两座高山夹着的一条小路。路右侧的山下有深涧。一位老乡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我们在后面一个挨着一个摸索前进。

从驻地的小村到仁怀,约30里路。部队摸黑赶路,竟整整走了一夜。到了城边,部队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迅猛向城内敌人发起攻击。一时,枪声大作,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向北逃跑,我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占领了仁怀县城。我们入城后,一边肃清残敌,一边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同时,奉军委命令留工兵连守仁怀,上干队学员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

茅台镇是座落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镇,对面也是山,中间有一泓清水河,河面约10多米宽,不可徒涉。河上原有简易木桥,人马多不易通过,我们在此基础上架设浮桥,让三渡赤水的红军主力方便通过。

村子旁边有一家酒厂,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厂。据说该酒是用麦子酿造的,有独到的制法,加上清泉水,故芳香甘甜,沁人心脾。为了保护酒家的利益,我们派人监护该厂,不许部队随便进入酒厂。

在茅台护桥期间,我与萧队长和几位老同志去过酒厂。未入厂,一股酒香扑鼻而来,酒厂里有很大的酒池,还

有一排排的酒桶。香喷喷的酒味弥漫厂区。管理人员打开酒桶，让我们每人品尝一小杯，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说：“好酒！好酒！简直是玉液琼浆！”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分享这一口福，我们买了一些酒带回去给大家喝。可以说，我们在茅台护桥三天，饱饮美酒三天。在这三天中，后方的主力源源不断地从工兵连架设的浮桥通过。而敌机每天都投掷大量的炸弹，并向我守桥战士扫射。好在我们事先已有准备，在山边挖了防空洞和壕沟，故伤亡不大。另外，我军的高射机枪手英勇向敌机射击，敌机不敢轻易俯冲下来，投弹不准，故未能断我交通。

我们完成架桥和护桥任务后，奉命离开茅台镇归还干部团战斗序列。临走前，老乡送我们几瓶茅台酒，我们都当作宝贝放在马褡子里，作为在路上解乏之用。

此后，我们随干部团又打过几仗，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上干队为我们党，为我们军队保存了一批精干的力量，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这是长征中的红色上干队不可磨灭的功勋。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方 强

干部团担负光荣的战斗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当时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即赫西斯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学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原红军大学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原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为三个步兵营,一、二营培养连排军事干部,三营培养连指导员。原特科学学校编为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和轻重机枪连营干部。干部团的干部配备是:团长陈赓,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周士第,政治处主任莫文骅。遵义会议后,我调任干部团党总支书记。

全团教学员工1000多人,学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上来的优秀排、连、营、团军政干部。主要战斗力就是4个营和上干队。

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在长征作战中为全军培养、训练、储备和输送干部;同时,负责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因此,在长征中它的战斗序列为中央第一纵队的第四梯队,由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指挥。先后参加过土城之战、第二次攻占遵义、两

次抢架乌江浮桥,以及强渡金沙江、攻占通安州、警戒安顺场等任务。在行军作战中,部队还不断进行政治形势和任务等思想政治教育及各项军事技术和战术教育,全团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不断提高,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

飞兵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26日,红军进入云南,直逼昆明。蒋介石急忙调动7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扑来,而金沙江两岸的敌军却非常空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所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果断地下达了强渡金沙江的命令。

5月2日,中革军委指定: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率干部团“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于4日上午赶到洪门渡架桥”;一军团先头团“4日午前到达龙街架桥”。各路军伪装为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

皎平渡(又名太平渡)位于云贵两省的交界处,是金沙江重要战略渡口之一。干部团的领导决定以第三营及工兵连和电台组成先遣营,另两个步兵营、上干队的特科营为本队。

先遣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团政委宋任穷率领先遣营行动,任务是抢占渡口,消灭江岸敌人,搜集船只,组织架桥,以便主力部队渡江。陈赓团长率本队,抢占江北40里以外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之援敌,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渡江。

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军帽上的

红军标记,伪装为国民党部队,进行强行军。沿途无论遇到何种敌军,一律应付,不予理会。

5月2日黄昏时分,先遣营赶到距渡口40里的沙志树作短暂休息,刘伯承总参谋长不顾急行军的疲劳,立即找当地群众做调查,了解渡口情况。经调查得知:渡口北岸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一个收税厘金局,还有40人的保安部队。同时了解到:南岸停有两只木船。刘司令员立即命令先遣营的尖兵连跑步前进,不惜代价,抢占船只,强行渡江,控制渡口。

前进中我便衣侦察员抓到一个骑马的人,是地方民团向皎平渡送信的通讯兵。检查其信件,内容大意是:“为防止红军渡江,将渡口南岸的船只全部开到北岸,如来不及,就全部烧掉”。尖兵连立即将俘获的敌兵和信件送交给刘司令员,继续向皎平渡急进。

当夜12时,尖兵连抢占渡口成功,刘伯承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带着先遣营本队也赶上来了,全营立即占领渡口,控制两只渡船。此时,中革军委电告:一、三军团已到达目的地,但在那里找不到渡船,且两渡口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主力红军不能从那里渡江了。因此,全部红军渡江的战略任务,只能由皎平渡一个渡口来承担了。

恰在这时,陈赓团长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也赶上来了。尖兵连在副营长霍海源指挥下,分乘两只仅有的木船,利用夜色,乘敌不备,迅速渡到北岸。尖兵排一上岸就抓住敌人一个税收人员,智取了敌人的厘金局,俘获了数十名守敌,缴获税款5000多银元,控制了南北两岸的渡口。随后又找到5只木船,总共7只船,为全军在此渡江创

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从而打破了敌人在金沙江北岸的整个防御体系,使敌人在沿江构筑的全部防御工事都失去了作用。

乘胜直取通安州

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一支川军部队正在向通安州开进,先头部队可能已经到达,企图逼进皎平渡,阻我红军主力渡江。

刘司令员命令:“干部团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通安州距皎平渡渡口有40华里,地势险要,对我军渡江北进确实是一大障碍。5月3日黎明,干部团除留一个连在渡口担任警戒外,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的带领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通安州奔去。

部队一接近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敌军遭遇。据俘虏供称:该敌是川军的1个旅,共两个团和1个迫击炮连,由旅长刘元璋指挥,企图抢占通安州,阻我北进。而我们只有3个营,力量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这样,又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了。

当时,敌人1个营的兵力正在向我方左侧逼近,右边山上也有敌人在防守。这时我尖兵连已经和守山口之敌打响。在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敌人又占据有利地势的情况下,团指挥所当机立断:命令第二营在正面佯攻,一、三营从敌右侧包抄迂回,向敌左侧发起猛攻。冲锋的部队在我重机枪、迫击炮的猛烈火力的掩护下,灵活机动,猛打猛冲,插入敌阵,用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在战斗异常

激烈的紧急情况下，周士第参谋长和我率领团最后剩下的侦察排出击冲杀，全团一举打下了“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我的守敌。凭着天险进行顽抗的刘元璋旅两个团和1个迫击炮连，在我团的猛烈攻击下，死伤累累，溃不成军，1名团长被我活捉，600多人枪被我俘获。残敌不支，向会理方向逃窜。

雪山低头“山神”惊

中央红军抢渡天险大渡河后，把蒋介石尾追的几十万大军全部甩在后面。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主要防守重要城市，这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最大的障碍却是邛崃山脉的夹金山——一座常年冰雪封冻的大雪山。

1935年6月4日，红军绕过雅安，击溃川军杨森6个团，占领了天全、芦山两县，向宝兴推进，直指夹金山。6月8日，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小，最后渺无去路，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苍劲挺拔的参天古树、遮天盖地的茂密丛林，大风吹不透，阳光射不进。丛林里阴暗潮湿，无路可寻。有时只得砍倒树木，开辟道路。时而攀援登高，时而顺坡下滑。有时遇到泥沟，两腿就在泥水中爬行；有时还要通过十分险恶的栈道。

部队接近夹金山时，我们干部团是中央纵队的前卫。过雪山我们没有经验，政治处派人四处调查。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过雪山的时间只能在上午，下午“神风”一来就过不去了。还说：过雪山的人都得穿上羊毛衣，喝烈酒，带上生姜和辣椒，以御寒壮气。又说：上山时一不能说话，二

不能笑，三不能坐下，否则，触怒了“山神”，“神风”就要把他卷走。

这些话自然都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御寒壮气道理，还是值得特别重视的。红军大部分同志都是来自祖国的南方，不适应高原、雪山气候，初次翻越大雪山，需要认真对待。所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要做好过雪山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资的充分准备。

走在前头的红三军团派回来几个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过雪山的经验。同时还规定：11点钟前通过。上山时一不要唱歌，二不要说话，三不要坐下来休息，四是走到半山腰时，不要快步，不要停步，也不要自己开路，只能跟着前人的脚印，缓缓不停地朝前迈进。

6月12日清晨，在宏亮的集合号声中，部队在砣碛村集合，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棍作手杖。9时，部队沿着溪边的小路从山脚下出发，向山上挺进。我带着团政治处几个宣传员，站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大声喊话，要求同志们遵守过雪山的各项纪律。并告诉大家，过了雪山，一、四方面军就要胜利会师了。

在半山腰里，正当大家喝点酒或辣椒汤暖暖身子时，突然狂风大作，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风雪吹打在我们身上，像刀锋刮着我们的脸和手。同志们早就把一切能御寒的衣被全都裹在身上，仍然抵不住风雪袭身，浑身哆嗦，打着寒噤。大家互相搀扶着，大帮小，强帮弱，同狂风大雪展开了搏斗。

眼看着离山顶只有200米左右了。然而，这却是最艰

苦的一段路程。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更加困难了。有的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好象呼吸要停止似的。我感到头晕眼花，腿酸脚重，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心里直想呕吐，似乎随时就要跌倒下去。但是大家都在忍受着，坚持着……

忍受就是积蓄力量，坚持就是争取胜利，我们终于爬到了雪山顶上。放眼四方，千里冰雪，云在脚下，完全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雪山终于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6月中旬，红军干部团和中央纵队来到达维村，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师，红三军团也和九军会师。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这里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这是一次两大主力会师的庆祝大会。我参加了这次盛会，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讲话，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庆祝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与口号声，震荡着山谷大地，激荡着每个红军战士的心怀。随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会师，加强团结，又在懋功天主堂召开了一、四方面军驻懋功干部联欢会。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兴高采烈，亲如兄弟，团结气氛很浓。

为萧劲光同志平反

6月下旬，部队在懋功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要干部团党组织为萧劲光同志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干部

团领导都熟知萧劲光同志的革命经历和所受冤屈。他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在萧劲光同志担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进入中央苏区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开始批“罗明路线”，后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其实是反对毛泽东正确的领导和军事原则。萧劲光同志就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五次反“围剿”中，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却被他们毫无根据地反诬是萧劲光同志推行“罗明路线”的结果。为此，他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4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5年监禁徒刑，开除了他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坚决反对，萧劲光同志被关押一个月后，就调到红军大学任教。长征开始后，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上干队队长。他虽蒙不白之冤，但对党始终忠心耿耿、积极工作。中央这次决定为他平反，深得人心。我被分配到干部团任党总支书记后，在政治上思想上很同情他。因此，我不仅代表党的总支同他谈话，而且个人也很尊重他，虚心听取和重视他的意见。萧劲光同志在政治上站得很高，以一个党员对党组织应有的态度谈话，因此我们的谈话和党总支会议进行得很完满，并向总政治部写了报告。7月间，部队到毛儿盖后，干部团党总支布置上干队党支部开会，讨论了取消萧劲光处分的问题，通过了恢复萧劲光同志党籍的决定。8月，中革军委就任命萧劲光同志为红三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军具体落实，使得每个红军指战员大大增强了夺取长征胜利的信心。

在长征中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王 永 濬

1934年7月,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已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红六军团遵照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的指示,从速突围出去,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根据地,并取得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的前身)的联系。为加强红六军团的领导,中央、中革军委还决定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立即进行突围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们技侦工作围绕这一战略任务进行了配合。

一、配合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会师

在突围前,任弼时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作了指示,要求我们除继续抓紧侦察周边敌情外,重点要多抄多破湘敌的密码。当时,在我们已破了的60种左右的密码中,湘敌密码较多,在这一方面已早有准备。

由于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对我军动向,毫无所知。我军9000多人,8月7日从遂川横石地区出发,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桂东寨前圩。当时我们侦悉,湘敌何键一面急电刘建绪派十五、十六两师追击我

们，一面令 1 个旅、4 个保安团防堵拦截我们。敌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各部迅速向郴州、桂阳集中，以观动静；十九师从邵阳向阳明山前进；长沙警卫旅车运武冈，协助地方团队防守。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在上述敌情面前，我军有从零陵（永州）取捷径抢渡湘江的意图。因此，我们对湘敌在湘江防务情况的侦察，特别抓得紧，严密监视敌台，侦抄密报，赶上用场。

然而湘敌何键、刘建绪对我军的举动也十分重视。当我军经汝城过郴州至宜章公路时，敌方即判断我军有向西转移之意图；当我军绕桂阳向新田前进时，敌方又肯定我军有从零陵抢渡湘江之势。于是敌方即调重兵到零陵地区，沿湘江西岸进行防堵。我军到达湘江右岸蔡家埠时，因迟到一步，无法抢渡，陷入四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中。

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我们越过阳明山，进入白果市，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急转南下，到达嘉禾县城附近。随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潇水，于 9 月 14 日在广西全县以南的界首胜利渡过了湘江，进占西延县（今资源县）城，并从此入湘。当时我们侦悉，湘、桂两省敌军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地区，防我北进。我军在通道以西 40 里之新厂，杀了个回马枪，把何键的补充一纵队、何平部两个团全部击溃。

在上述一个多月的征程中，任弼时同志根据从电讯侦察中得来的情报和我军内部电讯联系来指挥全军的战斗行动。夜间，他不拿到情报就不睡眠。一有所获，立即和萧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商定对策。电台同志只要一宿营，或在行军途中有个大休息时间，就不顾疲劳，架台进行侦

听,抄收敌人密报。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在湘赣苏区时破译的密码,我们也破了一部分敌人新启用的密码,约有十来种,从这两个部分取得情报。

西征开始以后,任弼时任命龙舒林为机要科长,负责管理机要工作和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的密息情报工作,而以后者为重点。例如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及要承办的事情,情报传递和密件携带,处理日常事务问题,参加密报校对工作,等等。机要工作和破密工作常在两间相连或靠近的房子里,有时就在一间房子里,各自分摊工作。

我军入黔后,经黎平、锦屏、剑河到黄平这段路程中,由于急行军,电台缺乏轮换班子,敌人频繁更换密码,对周围敌情逐渐不明。由黄平向石阡方向前进到甘溪时,我们再次陷于湘、桂、黔敌军的包围中。

此时,军政委员会向军内传达了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会师的战略意图,掩护中央红军向西转移。红六军团克服限难险阻,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了。

二、配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时党中央及中革军委来电要二、六军团向黔东和凤凰、乾城地区分开行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对此作了认真讨论研究,认为我二、六军团应集中行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在澧水上游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因为那里敌人兵力薄弱,战斗力不强,便于开展战略攻势,消灭敌人。于是领

导同志就决定向湘西永顺、桑植地区进军。

任弼时对我们无线电侦察工作作了三条指示：一要侦收、破译齐头并进；二要配合二、六军团向湘西进军的胜利；三要查清湘西方面的敌情，重点是湘西的陈渠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同志还制定了两条既有利于部队行动，又有利于技侦工作进行的保证措施。

一是时间有保证。在行军速度上，规定每天行程，少则七八十里，多则百里左右，拂晓前两点钟出发，跑步前进，中午前后即可达到宿营地。这为无线电侦察工作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二是安全有保证。在行军路线上，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选择最佳方案，避开敌人的阻挠干扰。我军于10月28日从南腰界出发，30日打开四川酉阳城，旋即向西经龙潭、龚滩转了一个弯子，把敌人调到酉阳以西，然后绕到鄂境百福司，再经龙潭调头转向东进到湘境招头寨，于11月7日占领永顺城。在十余天的行程中，我们迂回曲折，让敌难以捉摸，陈渠珍完全失去主动权。我们技侦工作就在这样又有行动又有安全的环境中进行。

我们初步查清了远近两个方面的敌情。远的方面敌情是：正当中央红军经湘南向西转移时，湘敌何键总部决定，以十五师在来阳、永兴之线，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在衡阳市、零陵之线，筑碉堡沿河防守，十九师、十六师向零陵集中待命。鄂敌徐源泉部队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地区。川黔两敌未有新的调动。这正是我二、六军团向湘西进军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近的方面敌情是：自从我军从酉阳、龙潭入湘以

后,敌陈渠珍令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 3 个旅对我军由堵截改为尾追。可是敌人是一支孤军,它完全在我军掌握之中。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决定诱敌上钩,消灭他们。我们技侦工作负责提供该敌动态情报。当我军于 11 月 13 日撤至离永顺城 30 里之钓矶岩,并把永顺河大木桥烧毁,以示怯战时,敌人尚在静观,没有做出什么判断。我军又向离永顺城 90 里之龙家寨北撤,并以小部兵力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表示无心恋战。我们从敌前线指挥周燮卿给陈渠珍的密电中知道,敌人对我军这次远距离再撤退信以为真,派兵紧紧跟踪追击我军。我军即于 11 月 16 日在龙家寨十万坪谷地埋伏,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就把敌两个旅大部歼灭,击溃又 1 个团,俘敌参谋长以下 2000 余人,缴获步枪 2200 余支,无线电台 1 部。

我军乘胜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座县城。接着攻占桃源,围攻常德,在其以西沅溪河地区,歼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大部,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的部分地区,并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组织游击队的工作。12 月 26 日,中共湘鄂川黔边区省委宣告成立。

我军的胜利和日益壮大,使蒋介石、湖南军阀何键、湖北军阀徐源泉大为震惊。蒋介石集中张振汉、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和陈渠珍等部共 11 个师又 4 个旅,加上 1 个保安旅和 4 个保安团约近 12 万之众,分 6 个纵队,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推进,企图最后聚歼我军。

为粉碎湘鄂敌人的“围剿”,红二、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决战防御、运动战的指示,建立了军事上

的集体领导。在龙家寨战役胜利之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军委分会机关同志于1934年12月10日移驻塔卧（永顺与桑植之间）。我们技侦工作就在塔卧展开了。任弼时根据当时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改变一台两用的做法，采用通信、侦察分开设台的措施，使两者各自向专业化发展，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无线电通信方面，将原无线电队提升为无线电大队，阎知非、江文分任大队长和政委，并将随二、六军团军委分会工作的50瓦总台叫大电台。在无线电侦察方面，则将用于此项工作的5瓦电台叫小电台，张有年任台长，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机要科长龙舒林兼任政委。无线电大队对小电台人力、器材和机器维修予以保证。为了培养电台工作的新生力量，任弼时还批准无线电大队举办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

在敌人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我军首长们选择湘敌李觉纵队为首先进攻的对象，预计在大庸后坪地区对该敌打一个歼灭战。我们查清了李觉纵队配属有十九师（缺1个团）、六十三师的一八九旅和两个保安团，共有9个团的兵力。1935年3月15日该纵队占领大庸后，沿澧水设防，推进到澧水左岸之鸡公垭。我军原想置重兵于澧水右岸后坪地区，待敌人于渡河立足未稳之际，进行猛烈攻击。结果这一仗未能打好，毙敌千余人，我亦有500人伤亡。

后坪战役之后，省委和军委分会，对敌情作了分析，决定对鄂敌取攻势，对湘敌守势；向北转移打运动战。然后再视情况，渡长江北进。

我们从密息情报得悉，进驻桑植之鄂敌陈耀汉纵队

判断我二、六军团分两路北进；鄂敌总司令徐源泉亦相信此判断，急于出动部队进行截堵。当我军于4月12日主动撤出塔卧、龙家寨时，我们即侦悉陈耀汉纵队五十八师一七二旅亦于同一天向陈家河出动。我军于13日在陈家河抢先部署兵力，将该旅围歼。在陈家河战斗时，我们又得密息，陈耀汉连续电请徐源泉令驻上河溪之四十一师进行侧背牵制；还要求附近之郭纵队驰往增援。他自己于12日晨亲率五十八师直属队、一七四旅和三四七团由桑植驰援陈家河，因在途中发现一七二旅已被歼，于13日午向桃子溪方向逃走，企图靠拢郭纵队。贺龙立即指挥部队冒雨南下，追击逃敌。14日午后3时，我军在桃子溪将该敌四面包围，全歼敌1个师部、1个旅部、1个团和一个炮兵营，缴获山炮两门。乘胜收复塔卧、桑植等地。

为了调动敌人，1935年6月9日围攻宣恩县城。该城守敌只有四十八师和保安旅各1个团。鄂敌首领徐源泉急令驻防来凤的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部驰援。6月12日张振汉率兵分三路向忠堡开进时，我红二、六军团抢先到达忠堡，占领阵地，设伏待敌。经过两天激战，歼敌四十一师师部、一二一旅和特务营，活捉了张振汉。在战斗中我方侦察工作对敌人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忠堡战斗后，我军又于6月23日开始围攻龙山。由于敌人按兵不动，而我军又缺乏攻坚战术条件，7月27日，我军解除对龙山的包围，转移到茨岩塘、兴隆街一带活动。我们技侦工作紧紧抓住敌情的变化，为领导同志指挥军事行动提供依据。

这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我军的“围剿”力量，从江西

调来谢彬八十五师归徐源泉指挥。徐源泉为了防我再入鄂西，命令驻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驻高罗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推至沙道钩；驻小关的八十五师开往李家河；驻高罗的暂四旅占领水田坝；来凤的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掩护八十五师、三十四师和四十八师向湘鄂边境开进。并限于8月3日完成之。8月2日，我又侦察谢彬给所属一份行动命令。原来敌人已知我军主力不在从小关到李家河沿线，而在茨岩塘、兴隆街方面，并向北移动。我军决定“声东击西”，先敌八十五师赶到敌必经的板栗园东侧利福田谷地设伏。3日12时左右，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1个营被我歼灭，并击毙师长谢彬。

由于我二、六军团取得了一系列歼灭战的胜利，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利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的空隙，我二、六军团迅速从慈利江垭附近向东推进200余里。在这次东进中，敌人除以飞机狂轰滥炸外，没有地面进攻力量。有一天，我们技侦工作从密息得知，敌将于次日空袭我二、六军团驻大堰之军委分会机关，我们当即转移驻地，结果敌机扑空，我首脑机关安然无恙。

在我军反“围剿”战中，敌方受打击最大最严重的是徐源泉的鄂军。他意识到红军有空中侦察情报，侦收、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电报。愤恨之余，徐源泉利用编发使用已久之“进密”译发一份离间我军之电报。其大意是说贺龙因与萧克失睦，已派员向宜昌行营接洽投诚。指令他的前方部队遇萧克部队即痛击之，遇贺龙部队则表示退让，诱其来归。徐源泉的部属接到这份伪造电报后，均不相信其

真实性。徐源泉为了解除部属的怀疑，又不打自招地用另一种密码发一份收回成命的电报。其大意是说前电系为欺骗共军而发。因共军已有他们的“进密”本，故令共军得之，骗使其内部自相猜忌，而濒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希望他们各部注意，勿生误会。这就是徐源泉在屡次战败后导演的一幕闹剧。

在从木黄二、六军团会师以来的 359 天的时间里，我们技侦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仅有的一个以张有年为台长、龙舒林为政委的小电台，日夜辛勤工作，监视敌人每一重要行动。破敌密码约有 120 种左右。其中特别密本约占 75%，来去密本约占 5%，普通密本约占 20%。前二者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发的，一部分是湘敌鄂敌两总部编发的。因为我们破译密码数量较多，破译技术亦有提高，这就为以后完成配合突围转移的任务打下了基础。

《东北抗日联军 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

赵俊清

1936年2月，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武装领导人及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具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以下简称《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自此之后，活动在东北各地即北满、南满、东满和吉东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军。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八、九、十、十一军。由于该宣言的发表，统一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制，使原有不同的部队名称归于统一，而且随着军队建制的统一，使抗日部队的组织愈加巩固，步伐愈加一致，进而更加适应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之所以能在1936年2月发表，并非偶然，它是符合当时抗日武装斗争形势需要，也是有一个实际酝酿过程的。

（一）

自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东北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阶层爱国群众，包括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下，

抵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武装,进行英勇的抵抗。在支援义勇军斗争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如南满的磐石、海龙,北满的巴彦、珠河、海伦、汤原,东满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吉东的宁安、密山、饶河等地建立了10多支反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有的甚至几经挫折,个别的遭到失败,但大多数最终由小到大,从十几人、几十人发展到上百人、上千人,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1933年1月26日,党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发出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实行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方针。遵照“1·26”指示信精神,东北各地已经在反日斗争中得到一定发展的、党领导的游击队等抗日部队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或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

1933年9月,在南满磐石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翌年11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934年3月,在东满各县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5年5月,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团,全军约1200人。

1935年1月,在珠河游击队(后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基础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团,全军约

700 余人。

1934 年 11 月，在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何忠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3 个团，全军约 1000 人。

1935 年 2 月，在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宁安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全军共 900 余人。

1935 年 8 月，在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朴振宇任副团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 4 个连，全团约 250 人。

1936 年 1 月，在汤原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篋任政治部主任（代理），下辖 6 个团，全军约 1000 人。

自贯彻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明显地发展壮大起来。各种抗日队伍也逐渐向人民革命军等党领导的队伍靠拢，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开始成为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这期间，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体还建立了一些具有上层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指挥部。如 1934 年 2 月 21 日，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司令部在临江县城墙砬子召集了 17 支抗日义勇军代表参加会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并一致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1934 年 3 月，由赵尚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爱民”、“好友”、“七省”等 10 余支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遵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

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等三项条件，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1934年10月，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军长李延禄在穆棱河北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1936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东北民众救国军、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等抗日队伍领导人在汤原吉兴沟召开军政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并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这些总指挥部、总司令部虽都冠以“东北”两字，但实际上都是地区性质的，仅是具有标志结成某一地理区划武装抗日统一战线意义的，它并不是全东北的，还不具备指挥全东北各支抗日武装的职能。

从上述情况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经过几年艰苦斗争，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过程中，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分割镇压，各支东北抗日武装分散活动在南满、北满、东满、吉东地区，各部队间相互隔绝，难以取得正常联系。因而就形成了各军军队建制、名称不同以及行动不统一的问题。虽然各军的番号是按上级要求以数序即一、二、三、四、五、六排列的，可是有的称东北人民革命军，有的称东北抗日同盟军，有的称东北反日联合军。即使是一个军头也出现了名称不一的问题。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其第四团就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这种军队建制、名称不一致的问题，不利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因为，军队名称反映军队的政治性质、政策倾向。人民革命军的字样，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根据土地

革命要求,反映土地革命斗争需要的。这一名称是从“红军”字样中演变而来的(东北地区的南满磐石游击队、北满巴彦游击队在贯彻“1·26”指示精神前都曾有过“红军”番号)。它难以反映当时斗争的主要任务、目标和团结、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共同斗争的武装部队的性质。因此,不断发展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有一个能符合当时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又能体现武装抗日统一战线要求的军队名称,这就需要统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建制。

(二)

统一东北抗日武装军队建制是需要一定条件和一个过程的。这种条件与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深化直接相关联,也是伴随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逐步确定、成熟而提到日程上来的。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为了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以实际行动促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2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了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接着,又于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是分析了当时形势。《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自治”为借口，夺我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滥言，企图吞并我全中国，日寇险狠，益见暴露。每一个有热血、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应知道，除抗日以外无生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已成为全中国同胞一致的思想行动。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为我中华民族国家解放自由发展的关键。

二是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顺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

三是公布了东北抗日联军的 5 条政治主张。

1、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

2、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性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救国，东北抗日联军便与其行动一致，对于海内外同胞，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的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

3、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4、凡被压迫民族，个人或团体或军队，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少民族联合战线，对抗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在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其他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

5、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东北抗日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宣言最后号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指出：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就必能达成成功胜利。

《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以领导人个人的名义第一次向全国发出的宣言。它率先响应党的《八一宣言》号召，把抗日部队统一建制，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并表明了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军队编组的态度。宣言中全面地阐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不分民族、阶级、党派、宗教、性别等等，只要是抗日救国即与之联合，所要联合的对象已扩展到极大范围，甚至昨日的汉奸走狗，今日若悔过自新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也在“提携”之内。这与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较，已大大突破了只强调与工农兵学结成下层统一战线的要求。此外，与各种反日武装联合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订立协定、实行联合作战、组织联合军总指挥部（这种形式在过去还经常被上级批评为“作上层勾结”）的

外部联合的模式,而是一律欢迎参加到东北抗日联军中来,开始实行吸收到我军内部,采取了队内联合的模式了。因而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

《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中提出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部队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就使东北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名称,改变了过去各抗日军队名称不一的状况。值得指出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称最先是杨靖宇根据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团结、联合义勇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联合指挥部的斗争中,于1934年2月提出来的。应该说这是在抗日战场上从事实际工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同志们,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的一个创造。“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称较比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更为科学,更为规范。它体现了党领导的这支部队的鲜明性质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抗日联军”,“抗日”两字表明了党领导的现阶段斗争任务、目标,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较“人民革命军”中的“人民革命”四字更能体现斗争的直接目标。“联军”两字,则更富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共同对敌之意。它较“联合军”减少一个字,显得更为简捷。自东北各抗日武装统一建制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之后,这个名称就如同一面光辉的旗帜,吸引着更多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投奔到这支队伍中来,进而使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同时,“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也成为东北人民企盼光明,求生存和争解放的希望。

(三)

《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后,根据这一宣言精神,从1936年2月起至1937年10月,党领导的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以及党所团结、联合的一些抗日军队,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1936年7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基础上编成,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军部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全军3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1936年3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基础上编成,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军部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全军3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8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基础上编成,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篈。军部下辖10个师,1个政治保安师,全军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1936年3月在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基础上编成,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军部下辖3个师,全军2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1936年2月在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基础上编成,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军部下辖3个师,全军3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6年9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基础上编成,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张寿篈(代理),军部下辖4个师,全军2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1936年11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原四团)基础上编成,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军部下辖3个师,全军1500余人。

以上七个军是党直接领导创建的抗日武装。根据党的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随着对义勇军、山林队团结、争取工作的加强,许多义勇军、山林队也被吸收到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中来,壮大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这七个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队伍。与此同时,对在我党帮助下恢复发展起来的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经过工作,也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其番号以数序顺排,他们是: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1936年9月在东北民众救国军基础上编成,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军部下辖6个师,全军2000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1937年1月在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基础上建成,军长李华堂。军部下辖3个师,全军1000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1936年冬在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亦称“双龙队”,该队1936年曾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基础上建成,军长汪亚臣、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军部下辖10个团,全军约1000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1937年10月在东北山林义勇军(亦称“明山队”,1936年5月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基础上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军部下辖1个师,全军约1500人。

以上抗联八至十一军是以党的统战对象为领导人的

抗日队伍(后来,其中有的人也被吸收到党内)。为加强对这些部队的团结、教育、联合工作,我党向这些部队派有政治工作人员。

根据各抗日联军部队的活动区域,在中共满州省委被撤销后,活动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一军、二军归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活动在北满地区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归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活动在吉林东部地区(称之为“吉东”)的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归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从1936年夏起,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将各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又先后组成3个路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936年7月组成,总司令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下辖抗联第一军、第二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1937年10月组成,总指挥周保中。下辖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以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1939年5月组成,总指挥张寿篈、总参谋长许亨植、政委冯仲云(1940年任)。下辖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及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标志着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正式的最终的结成,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担负的战略任务开始发生变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成为全国总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

熊 向 晖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刊载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回顾》(以下简称《回顾》)对此进行了记述,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该文存在一些讹误,现据史实,编写出这一斗争的历程。在台湾当局围绕所谓“参与联合国”进行鼓噪的情况下,重温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94年清朝政府战败,台湾被日本强行霸占。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在台北举行台湾日军的受降仪式,从此,中国恢复了在台湾省的主权权利。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1949年10月1日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

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就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政府的这一原则立场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

而《回顾》一文说：

（一）根据“国际组织惯例中的政府继承原则”，“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来继承”。这一说法是不对的。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反动政府，根本不是“继承”关系。在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长期斗争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从未提出过什么“政府继承原则”。

（二）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在致赖伊的电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政府成立之日，即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

根据。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在致罗慕洛的电报中，前半段内容与上电基本相同，结尾则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否认目前正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并也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言。”

《回顾》一文转述了周恩来致赖伊电中的几句话，然后写道：“11月2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主席，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继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这都不是事实。《回顾》接着又说：“这就引发了在联合国中，中国究竟应由哪个政府代表的问题，即世称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把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说成是“中国究竟应由哪个政府代表的问题”，这就违反了周恩来上述电报的精神，完全违反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这年11月25日，苏联出席第四届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亦称第一委员会）上说：“苏联代表团已经通知联合国，苏联代表团支持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1月15日)致大会主席的声明,该声明拒绝承认由蒋廷黻率领及由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到本届大会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拒绝承认这个代表团代表中国及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权利。”他说,“给予这个所谓‘政府’的冒牌代表的声明以某种重视,是与联合国的尊严不相容的。因为这个所谓‘政府’的权力,如果不把那一小块微不足道的中国领土计算在内的话,已不复能达到中国,就是这一小块领土,从蒋介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已计日可待了。”^①

对此,《回顾》一文写道:“11月25日,苏联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中提出‘中华民国已失去大陆,无权代表中国,中国的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替代’,这是联合国首次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发生争议。”这样的记述和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回顾》一文说,“1950年3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公布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及未来发生之同样问题,各会员国应以新政府是否有效地统治国家领土和人民为表决的依据。”该文结论:“这是联合国首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的原则性解释。”

《回顾》一文对这份备忘录中的关键语句略而未提,这就是:“中国问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特的,这并非因为牵涉一个政府的革命变递,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当前争执的问题应该是,究竟这两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9日。

个政府中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赖伊的这些说法，实际上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及其成果，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为这一所谓的“争执”定出解决的标准。所有这些都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赖伊的这份备忘录是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回顾》一文却说：“这是联合国首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的原则性解释。”

二

《回顾》一文在导语中说，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对直接指导了这一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这一动机是很好的。但文中除末尾处外，没有提及毛泽东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的“直接指导”的情节，这是缺陷。现举出三件史实：

（一）《回顾》一文说：“1950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要求安理会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史实是：1950年1月7日上午6时，毛泽东自莫斯科致电“恩来并中央”，内称，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来谈，“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① 同日下午12时，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泽东致电“少奇、恩来”，附上他亲拟的“声明电”，全文如下：^①

成功湖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于北京

这件事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在此只说一点：当时安理会有 11 个成员国（后增为 15 国）。除 5 个常任理事国外，还有 6 个非常任理事国。毛泽东写明此电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长“并转”指名的安理会 9 个成员国“政府”，其中当然没有窃据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同时，顾及当时斯大林的态度，此电也未给非常任理事国的南斯拉夫。

赖伊复电收到并转达。1 月 10 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宣读了周外长 1 月 8 日的电报并称：“苏联代表团奉苏联政府训令特此知照安理会：苏联代表团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声明，并且坚持将国民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1 页。

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马立克接着提出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的提案。在讨论过程中，轮值安理会主席的蒋廷黻被迫将主席职务让给古巴代表。美国代表反对苏联提案，理由是：美国“承认授权蒋廷黻出席安理会的政府”。他说，他将投反对票，但“不意味着使用否决权”。英国代表则说，目前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问题“为时过早”。1月13日，安理会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英国、挪威弃权，其余6票（包括蒋廷黻）反对。马立克宣称：“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直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被开除为止，苏联将不承认安理会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参与之下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并将不理睬这种决议。”苏联代表团随即离开会场。^①

（二）《回顾》一文说，“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主席和秘书长，指出：‘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应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在这里，《回顾》一文加上直接引号，似乎原电的措辞就是如此，而其实不然。）史实是，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自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称，维辛斯基“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②刘少奇复电提名章汉夫。1月18日毛泽东与已抵苏境的周恩来通电话商量后致电刘少奇称：“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首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月14日、16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席代表以洛甫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的电报，如中央同意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因恩来即到莫斯科，故照会用李克农名义”（此电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电中括号里的文字是改动或添加的。全文载 1950 年 1 月 20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起草的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请“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个）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这样）留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① 赖伊将此电作为正式文件分送联合国各会员国，并复电周外长，对所询第一项问题答以“联合国每一机构皆有依据会员国之资格证书采取行动之权。”对所询第二项问题答以“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工作问题，系由各该机构之决议来决定”。这显然是故意推托。

（三）《回顾》一文说：周恩来“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2—244 页。

“要求与我建交的国家不仅要断绝与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关系，还要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1月6日，英国原驻北京总领事格拉柏将英国外相贝文签署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照会送达中国外交部，照会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陛下政府业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成立所造成的形势研究完毕，而且鉴于这一政府有效控制中国领土的极大部分，业于本日承认该政府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政府应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公告，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互派外交代表。在未任命大使前，已任命J. C. 胡阶森为陛下的临时代办。”格拉柏还通知说：“陛下政府由于这一决定的结果，已撤销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这一决定已由国务大臣赫克脱·麦克奈尔于一月五日晚通知中国驻伦敦大使郑天锡博士。”^①周恩来外长于1月9日复电贝文，表示“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贝文外相指定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先生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

为来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的代表”。^①

按《共同纲领》规定,英国已符合与我国建交的条件。但1950年2月8日毛泽东自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称:“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②这样,毛泽东就为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补充了一项重要原则(而不是《回顾》一文所说的“斗争策略”),即:愿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如果是联合国会员国,必须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必须赞成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以此来鉴别是否真正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是否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这也是制止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的有效措施。英国承认了我国,断绝了同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对印度支那问题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长期未变。因此中国政府只同意和英国“半建交”——互换代办。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大创举。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月10日。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围绕美国侵略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中国通过联合国同美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回顾》一文有所提及，现作一些补充。

(一)在苏联不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情况下，美国于6月27日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提供军队和其他援助。赖伊通知各会员国执行。7月7日，美国又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的16国的军队。

7月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行动，正加深了这一破坏性”。“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我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公然侵略行动却又一声不响，

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二)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安理会,并任轮值主席。他以主席的资格裁定国民党代表以中国代表的名义出席是非法的。经表决,印度、南斯拉夫赞成,8票反对。马立克又提出初步议程,第一项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问题,第二项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遭到美国操纵的多数否决。美国则提出“控诉对大韩民国侵略案”。8月4日,苏联代表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主张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支持苏联8月4日的提案,坚决主张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9月1日,美国操纵安理会否决了苏联8月4日提案,苏联则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

(三)8月24日,周恩来外长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控诉和建议”,电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制止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8月27日,周外长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扫射我建筑物、车辆,使中国人民

多人伤亡,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朝军队,并使美军撤出朝鲜。8月29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根据周恩来外长8月24日的电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声明”为题,作为安理会临时议程。美国代表不同意,但又提出,若改以“关于台湾的控诉案”为题,美国将同意这项议程。经过争论,印度代表认为议题不要含有“预先判断”之意,改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福摩萨)案”。经表决,印度及英、美、法、苏、挪威和厄瓜多尔7票赞成列入议程。马立克接着提议,讨论该案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安理会,并提议,将周外长8月27日电报所提问题亦列入议程。由于美国阻挠,未获通过。9月10日,周外长又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讨论上述问题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美国又操纵安理会的多数予以拒绝。

(四)9月24日和27日,周外长两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第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杰伯,向联合国控诉美国的侵略暴行,要求联合国大会将我控诉美军飞机侵入我国领空、杀伤我国人民并损害我国财产的提案,美国侵朝军舰炮击和非法盘查我国商船一案,列入大会议事日程,并接纳中国代表出席讨论。

(五)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我们再一次明确表示,我们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方面,正如数十年来朝鲜人民站在中国人民方面一样,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

阴谋。”

9月27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安理会已同意将“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列入议程，但美国代表和国民党残余分子的代表一直阻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苏联坚决主张立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安理会有关台湾问题的会议。

9月29日，安理会接受厄瓜多尔代表的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福摩萨)案”。安理会又接受美国代表的提议，安理会讨论该案的时间应在11月15日以后。(借口是，苏联所提“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已列入联大第一委员会议程。)

10月2日，赖伊将安理会的上述决议电告周外长。10月23日，中国政府任命伍修权为特别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该案。

(六)遵照毛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夜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现后，于11月6日向安理会作了报告，诬蔑中国干涉朝鲜问题。11月8日安理会通过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报告的决议，并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与会。11月11日，周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主席称：“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在安全理事会没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常任理事国参加并在美国操纵之下非法产生的。因之它的报告不仅是片面的和别有用心，而且是非法的，绝不能作为讨论的根据。”中国不能接受安理会所决定的邀请。电中再次要求安理会将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

便中国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前一个议案时，同时提出控诉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问题。

(七)1950年11月24日，伍修权抵达纽约。同日，联大第一委员会通过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该委员会，参加讨论苏联提出的“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11月26日，周外长电告赖伊，任命伍修权兼任出席第一委员会的代表。

11月28日，安理会将美国提出的“控诉侵略大韩民国案”和“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福摩萨)案”合并讨论。伍修权在会上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武装力量侵占台湾，构成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公开直接的侵略。他着重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对联合国将所谓台湾地位问题的“福摩萨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提出严重抗议。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建议：“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人民的罪行”；“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美国代表否认美国侵略中国，把话题转向“控诉侵略大韩民国案”，并提出一连串诬蔑性的问题。伍修权于11月30日在安理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声明，决不参加荒谬的所谓“对大韩民国侵略案”的讨论，他指出：朝鲜问题的真相，正是美国武装干涉朝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安全，并具体指出侵朝美军侵犯中国领空的事实。严正宣布，“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侵略

者。”

(八)由于美国阻挠,联大第一委员会迟迟不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进行讨论。伍修权于12月16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此表示愤慨。他向记者分发了原来准备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稿,主要内容是:(1)美国政府积极援助蒋介石集团,供应武器及其它物资,指使它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沿海城市;(2)美国政府百般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美国把日本变为矛头指向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4)美国在太平洋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网,对中国造成包围形势。

伍修权12月19日回国后,联大第一委员会讨论美国侵略中国案。周外长致电该委员会主席,指出这是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又一诡计。应周外长的要求,该委员会将伍修权的发言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月8日,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给美军以沉重打击。在美国操纵和挟持下,1951年1月30日联大第一委员会、2月1日联合国大会先后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诬蔑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议案。在联大表决时,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缅甸投票反对,埃及、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弃权。

1951年2月2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僭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况下,竟通过美国诬蔑中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其后，不顾苏联、印度等国的反对，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及若干联合国组织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及其他一些反华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就是在美国在联合国掀起的反华逆流中展开的。

四

从1950年第五届联大开始，联合国有的会员国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提出议案，由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至1960年第十六届联大，有关情况如下：

(一)《回顾》一文称，“1950年9月，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召开。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未能出席大会。”而史实是：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完全没有参加联合国一切会议及其机构的资格，故必须将他们从联合国一切会议及其机构中驱逐出去。为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向阁下及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发出照会，声明以蒋廷黻为首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绝对无权代表中国；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一月十九日，二月二日，五月三十日，我又一再向阁下及罗慕洛先生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立即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从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等机构中开除出去，并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的首席代表，冀朝鼎为出席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代表，孟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代表。但时至今日，联合国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之内，而不将其立即开除出去，我认为这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要求。现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将于九月十五日召开，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为代表。请即转达有关各方，并即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之一切手续。专此奉达，请速电复。”

9月7日，赖伊复电周外长称，如果联合国大会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他将代为申请美国入境许可并安排接待。

9月17日，周外长再次致电赖伊，重申8月26日电中的主要内容，并称：“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或竟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内，则其所作的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决议，均将是非法的，因而也将是无效的。”

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的第一天，即投票表决了有关“中国代表权”的几项提案：

(1)印度提案：这是煞费苦心、用曲折的笔法写成的提案。内称：“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会员国”，“一个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除非由一个

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希望、对该会员国领土实际行使控制并且获得其人民的服从的政府所履行，否则就无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目前结构的中华民国境内行使职权的唯一这样的政府”，“上述中央政府视情况通过它的首脑或外交部长或它委派的代表，应有权在大会内代表中华民国”，“建议联合国的其他机构通过类似的决议”。

这一提案以 33 票反对，16 票赞成，10 票弃权未获通过。

(2) 苏联提案：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国民党集团代表不能参加大会及其机构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是中国的代表”。这一部分以 38 票反对，10 票赞成，8 票弃权，3 国缺席，未获通过。

第二部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指派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这一部分以 38 票反对，11 票赞成，8 票弃权，3 国缺席，未获通过。

(3) 加拿大提案：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建立一个由主席提名并由大会确定的七名会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中国代表权问题”，“向本届大会报告并提出建议”。这一部分以 38 票赞成，6 票反对，11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二部分：“在大会就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之前，应由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在大会内占有席位，权利与其它代表相同。”这一部分以 42 票赞成，8 票反对，6 票弃权获得通过。

由于通过了加拿大提案，我国代表未能出席第五届

联大。

《回顾》一文说：“会议通过了加拿大提案，即建议联大设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这表明联大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正义呼声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事实是，1950年12月12日，第五届联大通过了大会主席提名的“特别委员会”的七名会员为：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1951年10月16日，该委员会通知联大，它无法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提出任何建议。结果是，“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仍继续留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

（二）1951年第六届联大出现了“苏联提议”和“泰国提案”。“苏联提议”是：“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泰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延期审议从大会排除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在大会内代表中国的任何其他提案。”

大会以37票赞成，11票反对，4票弃权，8国缺席，通过了泰国提案，苏联提议未付表决。

（三）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起，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不再指使其他国家提出议案，而由美国单独提出议案。第七届联大至第十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延期审议所有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自第十一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

在这九年中，美国提案均以多数票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但在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中，却多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

1952年第七届联大，苏联提案：“对所谓‘国民党政府派至联合国第七届会议的代表的全权证书’视为无效，因为这些全权证书不符合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按，这一条规定只有一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才有权任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苏联代表指出，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政权的残余分子无此权力。）1953年，1954年，1955年，苏联在联大的提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派的代表应在大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中取得中国的合法席位。”1956年至1959年，印度在联大的提议及1960年苏联在联大的提议均为：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由于自第七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均通过了美国提案，苏联提案、提议及印度提议均未付表决。

《回顾》一文说：“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虽然与我友好国家曾多次提出‘排蒋纳共’的提案，但均为美国所提‘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所否决。”这一段记述是错误的。首先，在此期间，“与我友好国家”的提案、提议并不是“排蒋纳共”。其次，美国提案的措辞并不是“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最后，“与我友好国家”的提案、提议未付表决，而不是被美国提案“所否决”。

现将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至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

对美国提案的表决结果表列如下：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缺席	表决时会员国总数
1952年	42	7	11		60
1953年	44	10	2	4	60
1954年	43	11	6		60
1955年	42	12	6		60
1956年	47	24	8		79
1957年	48	27	6	1	82
1958年	44	28	9		81
1959年	44	29	9		82
1960年	42	34	22	1	99

(会员国总数中包括国民党残余集团)

在这9年中，联合国会员国由60增至99，美国提案虽都以多数票通过，但赞成票1952年为42，1957年为48，1960年又降到42；反对票1952年为7，以后逐年增加，1960年为34，弃权票为22。可见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越来越困难了。

(四)面对这一形势，美国变换手法，但《回顾》一文所说的三件均有讹误：

(1)《回顾》一文说：“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不再讨论排斥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或让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的问题。’”《回顾》一文中“蒋介石政权”和“中共代表”的称谓与上述美国提案所使用的称谓是不同的。所谓“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指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按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程序事项”不使用否决权，对“其他一切事项”可使用否决权，但任何常任理事国均无权事先要求安理会“不再讨论”某一问题。“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要求”安理会“不再讨论”《回

顾》一文所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并无其事。

(2)《回顾》一文说：“1960年美国民主党肯尼迪政府上台”，“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为此美国变换手法，在联合国中抛出了‘双重代表’的提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参加联合国，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排除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需要指出的是：第一，1960年美国是共和党执政，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第二，美国1960年在联大的提案是“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第三，肯尼迪作为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于1960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196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但美国并未在联合国中抛出“双重代表权”的提案。

(3)《回顾》一文又说：“60年代初”，“美国开始改变了其在联合国中的斗争策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规定，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列入联大议题中的某一问题，经会员国2/3的相对多数表决通过，该问题即为重要问题事项。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充分利用这一条规定，操纵联合国大会的相对多数通过议案，将中国政府取代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演变为‘重要问题事项’，以继续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联大总务委员会由每届联大主席、17名副主席和7名委员会主席共25人组成，主要负责在大会开始时，审议“临时议程”、“补充临时议程”所列之议题，拟定本届大会议程提交大会审议批准，把大会批准的议题交付各有关委员会讨论等事项，它与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毫无

关系。

第二，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是关于大会投票的规定，这一条分三项：

“一、大会之每一会员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二、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此项问题应包括：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议，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之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之选举，依第八十六条第一项（寅）款所规定托管理事会理事国选举，对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关于施行托管制度之问题以及预算问题。

“三、关于其他问题之决议，包括另有何种事项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问题，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之过半数决定之。”

为了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美国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做文章，详见下节。

五

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到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斗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主要是提案国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支持我国的提案的措辞更加明确。

（一）《回顾》一文称：“1961年12月，第十六届联大召开，与会56国代表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提案意见分为三类，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

家,强烈主张排蒋纳共,要求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一是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哥伦比亚五国提出的议案,主张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程序议题,而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是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国家,主张依联合国会籍普遍化的原则,两个中国都应有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对后两种提案进行投票以决定表决程序,结果大会以 61 票赞成、21 票反对、20 票弃权通过程序提议,先表决美国等五国提出的议案”。“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系重要问题,联大须以 2/3 的多数通过始能成立”。

在此先指出:第一,第十六届联大于 1961 年 9 月召开,与会 104 国。第二,在整个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出的“议案”或“主张”。在社会主义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朝鲜、越南、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联合国会员的情况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从 1963 年起,苏联即不再充当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国。第三,在第十六届联大,并无“两个中国都应有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回顾》一文说大会对这一提案与美国等五国提案“进行投票以决定表决程序”。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第十六届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只有两项提案,即苏联提案和美国等五国提案。

(1)苏联提案:这是在联合国中首次比较完整地表达我国立场的提案。全文如下:

“苏联提案: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大会，认为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鉴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才有权占有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中的席位。

“因此，决定立即把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的工作。”

《回顾》一文把这样的提案称之为“排蒋纳共”案这是很错误的。怎么能把“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称之为“排蒋”？怎么能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称之为“纳共”？这个“共”，只能解释为“共产党中国”。早在1957年9月7日，周恩来会见第一个访华的美国青年代表团，当一位美国青年提到“共产党中国”时，周恩来马上说：“我希望把这个名字更正一下。中国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好像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艾森豪威尔美国，或者共和党美国。那样说是不那么恰当的。”^①

(2)美国等五国提案：这是美国首次联合其他国家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提出的议案，提案日期是1961年12月1日，主要措辞是：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第248页。

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重要问题”共九个，其中涉及会员国的共三个，即“对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均与在联合国中改变一个会员国的代表权无关。以埃及为例，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这并未影响埃及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由此所引起的埃及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更迭并未构成“重要问题”，而是简单的程序问题。美国硬说，“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都是一个重问题”，成为需由“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的问题，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的曲解。

(二)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62年第十七届联大只有一个提案，即苏联提案；1963年第十八届联大，也只有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联合提案，二者的“议题”及基本内容与第十六届联大苏联提案相同，均因反对票多于赞成票未获通过。1964年第十九届联大，由于财政危机，联大瘫痪，未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三)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有两个提案：

(1)阿尔巴尼亚等十二国提案：“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主要内容：“根据1964年10月5日到10日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建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决定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

去。”

(2)美国等十一国提案：主要内容是：“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

《回顾》一文称：“第十六届联大以后”，“在联合国中，‘排蒋纳共’和‘容蒋纳共’的支持者数量日趋接近。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对前苏联提出的‘排蒋纳共’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与反对者均为47票。由于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通过重金收买了赞比亚一票的支持，使‘排蒋纳共’案仅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否则蒋介石政权在1965年就要被逐出联合国”。如上所述，在第十六届联大以后，并无“容蒋纳共”案。“前苏联”并未在第二十届联大提出“排蒋纳共”案，而是阿尔巴尼亚等十二国（其中并无苏联）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案。1965年11月15日大会进行了表决，确实“赞成与反对者均为47票”，但即使赞成者增加一票或几票，“蒋介石政权”也不会在1965年被逐出联合国，因为这年的11月17日，大会以56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了美国等十一国的“重要问题”提案。

《回顾》一文所谓“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通过重金收买了赞比亚一票的支持”，经询有关同志，均不知此事。赞比亚于1964年10月29日与我国建交，我国首任驻赞大使于1965年3月到职。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公开表示中国可以援建有利于坦桑尼亚、更有利于赞比亚的坦赞铁路。而在这一年的11月，赞比亚竟被“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通过重金收买”，投票反对阿尔巴尼亚等十二国所提出的议案，这是难以想象的。

(四)1966年第二十一届联大至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阿尔巴尼亚等国均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内容相同的提案,均未获通过;美国等国均提出“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的内容相同的提案,均获通过。

第二十一届联大至第二十三届联大,意大利、比利时、智利联合其它二或三国,提出议案,主张“成立一个由联大任命的委员会,提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公正建议”,未获通过。

(五)从1960年第十六届联大至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斗争可作以下概括:

(1)除第十九届联大外,共有九届联大九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基本内容相同的提案(以下简称“支持中国案”)。提案国在1961年及1962年为苏联,1963年起由阿尔巴尼亚牵头,提案国数自1963年至1968年分别为2、12、11、12、16、17。1970年为18。提案国及所提次数:阿尔巴尼亚7次;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古巴、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叙利亚各6次;毛里塔尼亚5次;坦桑尼亚、赞比亚、也门、南也门各3次;苏联、伊拉克、索马里各2次;南斯拉夫、加纳各1次。提案国无西方国家。柬埔寨1970年发生美国策动的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朗诺政变,在联合国中

转变了态度。

(2)60年代美国联合其它国家在联大的提案,内容均为“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下简称“重要问题”案)。提案国数 1961年为5;1965至1970年分别为11、15、14、18、19。提案国及所提次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各7次;菲律宾、泰国、巴西、加蓬、马尔加什、尼加拉瓜各6次;意大利、新西兰、哥伦比亚、多哥各5次;玻利维亚3次;比利时、西班牙、哥斯达黎加、海地、莱所托、马拉维、巴拉圭各2次;荷兰、冈比亚、斯威士兰各1次。意大利1970年与我国建交,在联合国中转变了态度。

(3)60年代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的两种议案的表决结果

	“支持中国案”				“重要问题案”				表决时会员国总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未参加	赞成	反对	弃权	未参加	
1961	37	48	19		61	34	7	2	104
1962	42	56	12						110
1963	42	57	12	1					112
1965	47	47	20	3	56	49	11	1	117
1966	46	57	17	1	66	48	7		121
1967	45	59	16	2	70	48	3	1	122
1968	44	58	23	1	73	47	5	1	126
1969	48	56	21	1	71	48	4	3	126
1970	51	49	25	2	66	52	7	2	127

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因美国等国的“重要问题案”以66票赞成、52票反对获得通过,但“支持中国案”首次获得多数票(51票赞成,49票反对)。这表明,恢复中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已接近胜利。

六

1971年是联合国中“中国代表权”的斗争进行决战的一年。在决战之前,有关大事如下:

(一)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基辛格表示: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政权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到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双方于7月16日发表了《公告》,内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壮大,美国感到它的对华政策已经到非变不可的时候了。^①

(二)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的议程,同时,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1)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①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合法 权利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2)“解释性备忘录”义正词严,表达了提案国及赞成这个提案的国家对我国的高度评价,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外交文书。详摘于下:

一、阿尔巴尼亚(提案国其他国名从略)等国政府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特别是对联合国组织的前途,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切身意义。

二、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断地谴责和反对少数国家政府,对享有威望的中国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推行的敌对和歧视的政策。

三、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有计划地策划的阴谋,剥夺了约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是联合国组织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大国的法定的席位。企图把中国人民的代表权交给蒋介石集团,完全是处心积虑地、荒谬地、危险地和顽固地无视现实。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关系方面一贯奉行旨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独立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和产生的一切分歧的政策。这一政策最好不过的例证,就是中国作为签字国,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五、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充分证明,中国真诚渴望和平,渴望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同她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中国一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斗争。

六、美利坚合众国根据对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制造的虚构的借口和指责,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这就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驳倒这些指责。应该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充分地尊重其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七、多年以来,某些大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隔离”政策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为公认的是,没有这

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已经充分证明,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把中国这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排斥在外,而同时又要求她承担她没有参与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是不可能的。同样,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否认她在联合国组织内所占有的合法席位。这种立场在逻辑上和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现实,同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捏造成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神话是不相容的。众所周知,自称代表中国、被安置在台湾岛的非法当局之所以还能够残存下来,那只是因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常驻在那里。

九、联合国组织最基本的利益是立即结束某些人无视一切原则继续要强加给国际大家庭的这种不能接受的和危险的局面。而且,这种态度所开创的恶劣先例,只能使许多会员国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途感到不安。

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和它所属的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对于加强这个组织的威信和影响是绝对迫切需要的。这就要求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它在与联合国组织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拖延这一不可避免的行动只能进一步导致在国际大家庭面前削弱联合国组织的威信。

(三)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美国将支持今年

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

(四)针对8月2日罗杰斯的声明,1971年8月20日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对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

“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这真是荒谬绝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

“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说什么‘联合国不应被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各自提出的彼此冲突的主张表明立场,以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平解决此事’。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歪曲。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和平解决争端,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则完全

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

“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有不少会员国,曾经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包括国家名称的改变,但都没有影响它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

“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

(五)1971年9月22日,美国伙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同中国代表权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

(1)“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全文为：“大会，忆及宪章的条款，决定在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重要问题。”

(2)关于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又称“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主要内容为：(一)兹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它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二)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三)建议联合国一切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决定中国代表权时考虑本决议的条款。

(六)1971年9月25日及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佐藤反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两篇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美日等国在9月22日向联合国抛出了所谓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是对中国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是美帝国主义坚持敌视中国人民、公然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阴谋的进一步暴露。佐藤反动政府追随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所谓改善“日中关系”纯粹是烟幕。佐藤本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传，日本充当联合提案国是“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外务省人士更加露骨地宣称，“坚持把台湾和中国分离开，是日本安全上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染指我国领土台湾省的狼子野心。

《回顾》一文说：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美国不仅再次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重要问题’案，而且还抛出了‘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

联合国，甚至占有安理会的席位，但同时仍保留蒋介石政权的席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会不得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权。然而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使美国的阴谋难求一逞。”必须指出，第一，美国并未“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美国等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提出的“重要问题案”和前些年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美国等国抛出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称”，在《回顾》一文中也大大走样。第三，周恩来并未“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回顾》一文还说，“1970年，……日本政府也在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上面已经指出真相。顺便提一句，佐藤荣作于1964年11月起担任日本首相。1970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说，在美国的扶植下，“佐藤政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届政府”。

七

《回顾》一文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第二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先于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进行表决。……11月25日，联大表决时，美国等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重要问题’的提案……首先被击败，这就是说，关于恢复我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提案只需要简单多数便可通过。接着联大开会……表决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提出的……提案,即‘2758 号决议’。表决结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很快就离开了会场,坦桑尼亚代表首先起立,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在这一段中,总务委员会被说成进行了它并未进行也无权进行的表决,美国等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重要问题案”被解释得面目全非。最后两件事也有出入。

现据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当时所载外电报道编整如下:

(一)为对抗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提案,美国等国抛出了两项提案。为争取支持,美国总统亲自给许多国家首脑写信。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在联合国内外和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二百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拉拢或威胁。美国一些参议员扬言,如果通过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日本也大肆进行拉票活动。蒋介石派其“外交部长”周书楷担任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代表团团长”,协同美、日争取支持。

(二)自 10 月 17 日(纽约时间,下同)起,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始进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约 80 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对立双方“旗鼓相当”。10 月 24 日辩论结束。25 日上午美国召集联合提案国举行“最后战略会议”,决定向未发言国家的代表做工作。会后美国代表“继续抱乐观态度”。

(三)10月25日晚,联大在主席马利克(印尼外长)主持下进行表决。

(1)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新提案:“北京回到联大和安理会的席位,台湾保留联合国的席位,直到台湾居民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究竟是和大陆中国结成联邦还是成为一个独立国为止。”

沙特阿拉伯提议,这些新提案需要各国代表考虑,所有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推迟表决。(“这是符合美国愿望的,以便多一些时间说服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

发言赞成推迟表决的有日本、菲律宾,发言反对的有叙利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

经唱名表决,联大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19票弃权、3国缺席(不丹、马尔代夫、阿曼)否决了推迟表决的提议。“美国受到程序上的严重挫折。”

沙特阿拉伯又要求对其修正案的前两部分进行表决,结果都只有2票赞成被否决。

(2)美国代表要求首先表决“重要问题案”,大会以61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获得先议权。美国代表“兴奋起来”。

(3)17个代表要求发言,解释对行将表决的三项议案的态度。“支持中国派魄力非常巨大,一个一个地登台,彻底谴责了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不合理和不正当。比起企图用手续方式取胜的美、日派,这一方是单纯明快,以理取胜。”

(4)大会主席将“重要问题案”进行唱名表决,结果是

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电子统计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而美、日代表则“沉默不语”，“表情坚若石头”。“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周书楷走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决定退出联合国，率领他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

马利克主席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交大会唱名表决。美国代表跑上讲台，要求删去该提案中“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一段。在许多代表们的反对声中，马利克主席裁决美国代表的这一要求不符合议事规则，表决继续进行。“在会场正面上方两侧，有表示投票颜色的镭光显示板（电子统计牌）。灯光按照副主席斯塔夫罗波尔斯的点名而挨次闪亮，赞成为蓝，反对为红，弃权为黄的灯光。”“代表们在点名过程中应答时，大厅里气氛紧张，当蓝色的灯光频频出现，表明23国提案将被通过时，气氛活跃。”“25日晚11点20分，电子统计牌显示，23国提案有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马尔代夫、阿曼缺席。周书楷已离开会场）。支持中国的代表们全部起立，高举双手用各国语言向会场四周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马利克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并说他将立即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由于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被通过，美、日炮制的

“双重代表权案”成了废案。

(四)美国首席代表布什在表决后发表谈话说：“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了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12月26日，罗杰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和我们的提案的共同发起国曾全力进行努力，以防止中华民国被驱逐，”“美国认识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已表达出来，我们当然接受这个决定。”

关于《回顾》一文所说坦桑尼亚代表“跳舞”之事，美国有的报纸曾有此描述，并诬为“不文明”，扬言此举将使美国公众减少对联合国的支持。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曾郑重地说：“关于代表们在走廊里或别的地方跳舞的新闻报道是对事实真相的蓄意歪曲。我们看穿了进行大肆诽谤和在散布这种捏造的消息之后装腔作势表示愤怒的动机。”^①萨利姆现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时特意会见了他。对他早已正式驳斥过的流言，特予说明。

八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告以“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全文，并称，已将这一决议“通知了联合国所属的一切机构，并且相信上述决议将迅速得到全面实现。”

^① 《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8日。

1971年10月29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来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声明》还指出，“美日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甚至妄想让蒋介石集团以所谓‘台湾独立’的名义重新挤进联合国。这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绝不容许他们的阴谋得逞。”《声明》最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15日电：“会议在当地时间十时半开始。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坐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马利克致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地时间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但由于时间不够

而未能发言。许多代表的欢迎词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事业的领导。有的代表还热情朗诵了毛主席的诗词。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词以后，乔冠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一片对中国友好的气氛。”

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的25周年。据报载，外交部发言人7月24日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不甘心连续三年在联合国的失败，今年又围绕所谓‘参与联合国’进行鼓噪，极力拉拢和收买少数国家为其张目”，并且指出：“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公然无视历史，提出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通过的2758号决议提出挑战。这真是荒唐之至。

1996年3月8日江泽民在人大分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去年1月，我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月7日李鹏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涉。”3月11日钱其琛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台湾当局声称不惜重金，企图买一张进入联合国的入场券。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组织，台湾是一个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它

怎么能够有资格参加？”以上这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的立场，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并终于由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对此，本文作了历史的回顾。

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使当时美、日等国炮制的“双重代表权的决议草案”成为废案，挫败了少数国家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

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当时投反对票的35国和投弃权票的17国中，绝大多数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有159个，它们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收买、拉拢少数国家向第2758号决议提出挑战是徒劳的，它妄图挤进联合国的丑恶行径只能以失败告终。

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郑 谦

批林整风运动，是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至 1973 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顽强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

一、在“左”的错误框架中批林的矛盾处境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领导全党、全军，比较稳妥、顺利地处理了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稳定了形势。

为彻底清除林彪集团对军委工作的干扰和破坏，1971 年 10 月 3 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为彻底审查、理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

团的问题，同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何以会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怀疑和愤懑，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迅速、集中地爆发、渲泻出来。再者，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武斗”遗留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激化起来。为安定人心、稳定形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萧劲光、杨得志等老同志纷纷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严厉谴责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决策。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了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论”、“有权就有一切”、“三十字

方针”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等谬论，愤怒谴责了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抱病参加座谈会的陈毅作了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了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时期林彪所犯的错误，揭穿了他“一贯正确”的假象，深刻指出伪造历史就是犯罪。朱德、刘伯承等分别提交了书面发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并逐步向全党全国传达的同时，中央还采取有力、稳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慎重、妥善地处理了一些重点地区、单位的人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团插手较深的地区和单位，中央首先把重点放在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等问题上。在中央派出的负责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采取隔离审查、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对那些在林彪集团阴谋活动中卷得很深或比较深的人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对一些虽然有些牵连但没有过多卷入而问题确实较多的地区和单位，中央则以较长的时间，反复、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一伙蓄意在一些地区、部门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同时，由于“全面武斗”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积累下来大量尖锐的矛盾，林彪事件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与林彪集团有不同程度牵连的领导或受到审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压制、迫害的对立面的批判和冲击，一些已经实现的两派联合又出现松动或分裂，一些原派

别组织的少数人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账,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挨整干部和整人的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在运动中被关、押、审查的人把矛头指向那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些领导干部或是捂盖子、转移方向,或是对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干,等等。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又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又出现某种混乱局面。

中央对此已有考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分别在北京召集武汉地区、成都地区、陕西、兰州军区、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广州军区、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军等省、自治区负责人及驻军负责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及在本地区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及张春桥、王洪文等分别参与一些会议,帮助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及调整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党中央的这些措施,比较稳妥地解决了一些省、自治区及军兵种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在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制止了派性,促进了团结,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斗争可能导致的较大反复,稳定了形势。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陆

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和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还是按照“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林彪的斗争的。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按照这样的逻辑,林彪事件的发生反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显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发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批林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地方纷纷反映,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特别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认为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划,思想界限难分”。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一是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等待别人的经验;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感到真假难分”。某地反映,《解放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地群众感到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批判过的刘少奇的言论一样,这样批林“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机局举办300多

人的大批判骨干学习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业务关系上的诡辩论”。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发言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题目。

1972年1月中央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里，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或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当时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种整风又往往

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在联系实际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无限上纲和乱抓“小林彪”的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倾向。某地确定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果一些县、社又在农村批了“搞副业单干”、“私人开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5·18”讲话时,上批下联,把一个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清理财务,搞经济退赔,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在整风中挨整,或“等着挨整”。在城市和工矿企业,整风往往又引发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争斗。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批林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难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掌握。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但是,与这种倾向同时存在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当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九·一三”事件后,深受动乱、武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仅仅是凭着他们的本能和直觉,便会自然而然地

将林彪集团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极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把它的真实性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群众面前了。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这一思潮和倾向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引导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间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分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的框框里做着既难于被群众接受，又实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类的任务。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就突破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二、周恩来领导的纠正“左”倾错误、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从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

史。这种反思使他进一步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热情洋溢的赞扬和肯定。他虽然还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确实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明显漏洞，并在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内，着手纠正一些错误。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他曾对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过头的言行采取了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乱”到了几乎失控的时候，他又对极左思潮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王、关、戚”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不时批评过极左思潮，甚至把它归结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毛泽东决心削弱林彪集团的时候，他所选定的主要突破口，便是林彪等人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的言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是把极左思潮的表现和破坏与林彪集团直接等同起来。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有时已超出了极左思潮的范围，而对“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也有所触及。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

后天要打到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九·一三”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

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1972年1月，萧克从江西永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一面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克同志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给予适当工作。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枫、张执一等许多老同志或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

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内健康力量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间，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间，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

左思潮”等用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备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

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

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①。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一个月内在议事日程来解决!”^②4、5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

①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①。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

^①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组织广交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纪录，1972年4月9日。

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条》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5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

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当地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跟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

年10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

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

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①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

^①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36页。

合起来。”^①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页。

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

业务的空气,教师争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

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散会后,很多厂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所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①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页。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972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月25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许多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度上。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

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三、江青集团对批判极左思潮的 反扑及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项工作的斗争，顺应党心民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许多领域里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and 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对极左思潮批判的范围，实际上开始了对“左”的错误的清算，这是不妥协的反对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

“九·一三”事件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林彪集团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团，一度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说1972年上半年他们对周恩来等的工作还只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随着深入发展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危及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便全力展开了对周恩来等的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江青等人立即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在张、姚的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①。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

^① 参见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思想抬头”^①，江青认定“这个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动，张在市委常委会上攻击说，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海都要顶住”。这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以龙岩等人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斗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公开化了。

11月28日，根据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思想，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指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语言，从反面准确地说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

^① 1972年11月14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

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对报纸宣传方面的情况也同样适用。王若水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谈到了对王若水来信的看法。他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很快就从各种文件、文章中消失了，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1973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则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这种明显的变化立即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疑虑和不安。许多地方反映“批林联系实际的问题又成了问题”，“不知应联系什么实际”，“到底是反左还是反右”？基层纷纷要求省委明确态度，省委又因不摸底而含糊其辞。一些企业不敢再提劳动竞赛，一些学校不敢再提“以学为主”，一些农村地区也不敢再公开提《六

十条》、按劳分配、自留地等问题了。一些了解底细的省、市，则已经改弦易辙。1973年1月在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的是“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判‘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2月初召开的辽宁省批林整风座谈会上，认为从1972年9月以后，把批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当作林彪路线的实质来批，是“没有抓住林彪反动路线的要害”。

毛泽东的最后裁决虽然改变了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因于它的正义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使它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向前发展着。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顽强地继续领导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上半年间，周恩来在一些重要场合，仍然多次尖锐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对经济、外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经济方面，他指出，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①。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不满、隔阂，不能与中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后，我们就主动”，“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① 1973年2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的讲话。

和破坏,对遭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即毛泽东否定批判极左意见的第二天,周恩来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的意见,同日,他还向毛泽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得到毛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3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在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任职,是周恩来在困境中继续批判极左、落实政策的重要成果,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反对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公开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江青集团有恃无恐,疯狂反扑,周恩来虽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苦撑,但已经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江青等人的反扑,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作为突破口。5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里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

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报告把这些正确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污蔑为“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当前的大好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而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难以容忍。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外,还尖锐地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接着,他上纲道,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通过对外交部的指责,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令,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

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适合了江青等人反击“批判极左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加以转载，《文汇报》等以张信为由头，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等。7月28日，江青、张春桥等又在审查影片《园丁之歌》时发难，指责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为了否定批判极左思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变化，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反击“右倾回潮”，在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一伙，又指使迟群等在清华大学搞了“三个月运动”，反击“教育界出现的一股翻案风”。

从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集团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对1972年整顿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进行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批林整风运动随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失去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打着批判林彪的旗号，全盘否定周恩来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从全局上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抬头，生产、工作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再次下降。“四人帮”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觉悟，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坚实基础。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 采 青

发生在 1974 年的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妄图实现其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组阁的阴谋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

风庆轮事件从 1974 年年初开始,一直闹到年尾,从上海一直闹到北京,闹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迫邓小平表态,迫使邓小平不得不与江青面对面进行抗争。会后又把这件事报给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和远在湖南的毛泽东主席。这一事件,虽然随着“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成为“四人帮”政治阴谋棋盘上的一个七彩肥皂泡,但是,直到 1976 年“批邓”时,江青又祭起风庆轮事件,欲将邓小平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又被毛泽东主席制止。这些事实都说明,无论从哪方面看,风庆轮事件都不能算作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小中见大或由小及大的政治事件。

本文拟对风庆轮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关系国策的情况进行评述。

一、风庆轮事件的序幕

远洋运输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举足轻

* 本文采用了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向 1978 年 5 月全国交通战线工业学大庆会议提供的关于“风庆轮事件”的部分资料。

重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注这项事业的发展。由于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地开展后,为了解决海洋运输方面的急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租用外轮,这不仅需要国家付出可贵的外汇,而且受雇于外轮的我国职工,常常在经济上受盘剥,在政治上受屈辱。

那时我们还只能在迫不得已租用外轮的同时,尽快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但是落后面貌的改变决不能一蹴而就。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组织的上海造船大会战时,我们仍然没一个万吨级船台和必需的大型设备。广大干部职工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克服困难自行造船的。据国家计委于1970年12月上报的计划执行情况称:即将建成的9艘万吨级客货轮,相当于以往20年所建造的万吨轮的一倍半。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承造的。江南厂于1973年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前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风庆轮完成建造,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这件大好事却被“四人帮”及其党羽当成了浑水摸鱼的天赐良机。

最初的问题发生在风庆轮轻载试航的过程中。在正常情况下,上海远洋公司在接收风庆轮之前,就试航中发

现的质量问题提出意见和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江南造船厂在完成移交使用之前,应该尊重公司方面的意见,采取改进措施,提高质量。本着对工作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这种分歧本来是不难解决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但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却把事情越闹越大,直至闹出了一个风庆轮事件。

问题的症结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当时在全国批判所谓右倾回潮的余音未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即将启动。“四人帮”及其党羽,正凭借他们的反革命嗅觉寻找时机,兴风作浪。这时发生了关于风庆轮部件质量问题的分歧,“四人帮”党羽控制下的上海市工交组便蓄意歪曲事实,扩大矛盾,以求一逞。

具体情况是:当时公司方面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0.15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四人帮”的党羽却说: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的“磨损仅为0.08毫米,完全属于正常。”实际情况是他们玩弄了一个花招,把单边磨损0.15毫米平均到两边,即把0.15毫米磨损值除以“2”,再四舍五入,得出磨损仅为0.08毫米的虚假结论。然后以这个弄虚作假的结论为根据对交通部进行污蔑攻击,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如何地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迷外”的典型等等。

1974年1月,姚文元为准备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回到上海进行活动,收集材料。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金祖敏(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

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迷外思想有所抬头。”马天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一听,如获至宝,立即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搞几个材料给我。”

1974年初姚文元的上海之行,为上海党羽们的反革命活动撑了腰,打了气,加了油。

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等等。经陈阿大点火,江南厂的一些人贴出了题为《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文汇报》急忙要来了大字报原文,登在该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让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马天水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

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污蔑交通部及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等等。

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分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远在大连的红旗造船厂,也在“四人帮”辽宁死党的指挥下遥相呼应贴出大字报,攻击交通部天津远洋运输分公司是“天字号崇洋公司”。

金祖敏根据姚文元指示，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该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则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大年初一写信给姚文元，报送了这份材料。

下面是金祖敏于1月26日致姚文元信的节录：

在本月十七日您接见市总工会常委时，我汇报了前一段到工交系统所听到的一些反映，即在当前工业战线上崇洋思想又有所抬头，这次我又作了进一步了解，现将我所听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报告如下：

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依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

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以上……请张春桥、王洪文同志阅示。

姚文元在金祖敏的信上批道：这是“崇洋卡国产的典型例子”，“相当尖锐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姚文元还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是否印出来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还声称：“简报上是完全看不到这类材料的。”

之后，金祖敏的信和材料果然以《金祖敏的一封信》为题印发。姚文元还寄了一份给上海的金祖敏，所附便条上写着：“信已经印出，寄给你一份。”

马天水立即让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了此件，并补拟一个通知，发到上海市工交系统。同时，又报送给张春桥、姚文元。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上海全市立即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迷外”的造势行动。一时间，接二连三地召开了各种联合批判会、现场批判会。批判会上攻击买船是“崇洋迷外”、“依赖进口”，是“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卖国贼的衣钵后继有人”等等。最为别出心裁地是搞了一个全市性的歌咏大会。组织者指定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的同志们去唱《自力更生造船好》的歌，同时，让公司领导作为对立面到会接受“唱歌批判”。被徐景贤请去大会的“四人帮”文化部死党于会咏在会上说：“中远公司的人自己唱《自力更生造船好》，这是给领导的一张很好的大字报”。实际上，中远公司被指定参加唱歌的同志思想上很抵触，组织者却说：“这不碍你们的事，路线问题主要是指上头的。”可见，他们的矛头所向了。

二、风庆轮事件的背景

那么，“四人帮”及其党羽为什么要利用风庆轮大作文章呢？这就要联系风庆轮事件的背景进行分析。

风庆轮事件的大背景是正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

自从1969年开过党的九大以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就提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日程。就在筹备大会期间，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抢班夺权的问题及九·一三事件，推迟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时间。直到批林整风大致结束的1974年，才把这件事再次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由于“四人帮”在党的十大攫取了重要权力，他们利令智昏，认为羽翼已丰，妄图在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为此，从1973年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他们就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对“四人帮”来说，在其党羽中选拔拼凑一套班子并不难，难的是必须排除组阁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以及国务院所属主管部门那些恢复了领导工作的老同志。

出于以上政治需要，“四人帮”在1974年新年伊始便大张旗鼓地造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声势。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影射史学的效用，他们极力企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利器对付政敌。他们曾利用批判走后门，以求一逞，但是很快被毛泽东揭穿予以否定。不过，姚文元年初的上海之行却带回来他们认为可用作重磅炸弹的风庆轮问题。

背景之二便是抓住风庆轮问题大作文章，被“四人帮”认为是对他们最有利，也最有效的突破口。一则，他们具有地利的优势，这颗“炸弹”的制造乃是上海的死党爪牙，在他们眼中上海当时乃是他们的“帮天下”，借风庆轮问题兴风作浪，上下串通十分方便。二则，抓住风庆轮大作文章可以由小及大，从中引出一个关系国家建设的方

针问题,可以对政敌上纲上线到方向路线上去。正如“四人帮”死党爪牙所做的那样,可以用“崇洋迷外”、“洋奴哲学”、“刁难国产船、依赖进口船”等等罪名,从下往上追,往上批,直至打倒政敌,为他们组阁让路。

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被“四人帮”抓住不放的外贸进口及利用外汇买船的实际情况。

关于对外贸易情况是这样的: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领导批极左,让国务院有关部门抓计划、抓管理,使我国的经济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其中又以扩大外贸的成果为最。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开展外贸工作。1973年党中央、国务院任命李强担任外贸部长,并请陈云进行指导和协助。李强部长常常亲临外贸第一线,亲自领导和操作,在黄金买卖、期货贸易方面收获甚丰,外贸部门在短时间内就赚回了30亿美元^①。同年,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比如,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求报告》,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如果加上以前确定和后来追加的项目,共计用外汇51.4亿美元。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列引进项目,对

^① 参见《无愧无悔的人生——记李强同志》,原文载工人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献给后代的报告》。

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积极作用。

然而，“四人帮”及其党羽，出于他们的本能总是对国务院工作的成就切齿痛恨，总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他们所攻击的所谓“进口风”的实质。

关于利用外汇买船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历来是十分关注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主席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总理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又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计划执行期间。但是，事实本身正好说明，我国在买船的同时，也在积极造船，不然怎么会有万吨级的远洋货轮风庆轮的诞生呢？交通部的人在轻载试航后提出质量方面的某些不足，正是为了使国产船性能更臻完善。这里“四人帮”及其党羽蓄意制造事端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汇买船，本来就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可见“四人帮”并不真正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针对“四人帮”在造船与买船问题上蓄意捣乱破坏的

行径,李先念副总理于 1974 年 3 月 8 日作了针对性很强的指示: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应当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加快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并不排除在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的运费就要三亿多美元,数目太大。为了加强我国海上运输的能力,适当购买一些船只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东欧一些国家,生意还可以多做些,从他们提出的贸易货单当中,进口一些船舶,可能对我们有利。

.....

(五)广东、上海以油为原料的大化肥厂,一旦建成就需要有较大的油船,如五万吨的或更大一些的。建议早点筹办。否则,只靠火车运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外,我们也在进口矿石,装运矿石万吨船不行,吨位要大,也要考虑解决。

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既是对“四人帮”的回击,也是对国务院既定的既要积极造船,也要利用有利条件买船这个方针大计的坚持。

据统计,截止到 1974 年年底,我国的远洋船只发展到 304 艘,共计 450 万载重吨。

不过,“四人帮”是决不善罢甘休的。

三、风庆轮远航及远航途中的斗争

就在风庆轮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段日子里,风庆

轮结束了重载试航并移交给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使用。接着，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内让风庆轮远航欧洲，国务院作了报告。

在对待风庆轮远航的态度方面，“四人帮”的党羽表现得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他们既想捞一张反党“王牌”，又没有把握。起初，他们曾大叫大嚷要求让风庆轮远航，那时他们以为交通部不会批准，他们就可给交通部罪加一等。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于是马天水诬蔑说：“有人故意下令远航，是要整整上海，想要我们好看”。叫喊远航最凶的黄涛这时也变了腔调。黄涛说：“交通部到来将我们一军了。”还说：“风庆轮远航不该一下跑这么远，风险太大，该先跑几趟近洋。”

不过，在交通部已经下令让风庆轮远航欧洲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召集上海一二百家工厂，为风庆轮远航赶制备件，而且实行了包干责任制，谁家提供的产品，由谁家负责，如果出了问题，就要唯谁是问。原来有争议的部件也偷偷地换了下去，而且备件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认为，风庆轮远航胜利了，就可以捞到一张反党“王牌”。用黄涛的话说，他们就是要“同党比输赢，争高低”。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帮”就是要同我们的党“比输赢”，为此才要下这笔大赌注。

此处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对待风庆轮远航的胜败、输赢问题上，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的看法比他们的党羽是更为高明的。张春桥说：“风庆轮即使沉了，也是个胜利。”这

显然是因为让风庆轮远航这件事，是交通部决定并得到国务院批准的。即使在远航途中沉到大西洋或者印度洋里，其责任当然在交通部和国务院。所以，这对“四人帮”来说，也是胜利。

交通部为了保证风庆轮远航的安全，做了许多细致的准备工作：特地安排了一艘远洋船与风庆轮结伴航行；还特许风庆轮必要时可在国外进行修理；派了远洋运输总公司的一位负责同志前往上海对风庆轮远航作督促检查安排；指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上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工作。李国堂同志任副政委，顾文广同志任实习三副。

李国堂、顾文广（以下简称李、顾）两同志奉命于1974年4月17日上风庆轮工作。但是，李、顾两位同志的到来被“四人帮”的党羽认为是交通部“不怀好意”，“来者不善”。马天水、黄涛让船上爪牙“在航行中密切注意”李、顾的“动态和表现”。被委任为风庆轮政委的朱栋（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党委委员、航远组负责人，当时已投靠了“四人帮”上海死党）上任伊始就布置人盯住李、顾。

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港启航，同年9月30日返抵上海港。在将近5个月的远航往返途中，围绕着要不要批判进口船舶就是崇洋迷外等问题，朱栋与李、顾二人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

航行于大洋中的风庆轮上的斗争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缩影。

最初的斗争发生在研究风庆轮党支部工作计划时，朱栋遵照“四人帮”死党旨意主张继续批判“崇洋迷外”。

李、顾二同志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表示坚决反对。

风庆轮到达罗马尼亚后，在船上进行单航次总结时，朱栋竭力主张把风庆轮远航说成是“争来的”，是“批出来的，斗出来的”，是批“崇洋迷外”的结果。而李、顾则主张单航次总结应主要谈胜利完成单航次任务的情况，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为胜利返航做好准备。朱栋则诬蔑李、顾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说李、顾要搞的是技术总结，他则要搞“政治总结”。李、顾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的“政治总结”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接着是返航到大西洋时，朱栋又以工会名义举办船员脱产学习班，要大家学习“四人帮”帮刊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登载的《批“崇洋有理”》的文章。顾文广同志据理反驳，指出买船是根据国家外贸和援外运输发展的需要，考虑到长期租用外轮太受制于人，每年还要花一大笔外汇。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买进一些船只有何不可？而且买船都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顾文广同志还指出，《批“崇洋有理”》的文章强词夺理，不能使人信服。顾文广同志义正词严的发言博得了船员们的热烈支持。可见，李国堂、顾文广同志是并不孤立的。

在风庆轮远航期间，大约在1974年6月间，王洪文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诬蔑买船是“假洋鬼子”。8月间，当张春桥得知风庆轮通过好望角到达罗马尼亚的消息时，认定借风庆轮大作文章的时机已到，他严厉指责《人们日报》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登在报缝里？并下令：风庆轮“回来后要开排炮”、“要登头版头条”、“要搞连续报导”、“进

行大宣传”、“要组织欢迎”，“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上海的马天水和朱永嘉立即向上海宣传部门作了布置，定了基调：“要把洋奴哲学好好批一批”。《解放日报》社立即通过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发了一封约稿信给风庆轮，要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回击洋奴哲学”。接着，“四人帮”的黑指示也传到风庆轮上，朱栋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搞批判，并对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进行政治陷害。

1974年9月9日，风庆轮离开毛里求斯在印度洋航行时主机增压器故障，不得不停下来修理47个小时。期间漂离航线52海里。美国军用飞机三次飞临风庆轮上空盘旋。鉴于情况严重，李国堂建议向公司发电报，如实报告情况。船长也按制度规定起草了电报。但是，朱栋公然违反规定强行压下电报不准上报，并反诬李国堂同志“胆小怕死”，“强迫船长发求救电报”，还指使人在黑板上辱骂李是“假洋鬼子”。顾文广同志严厉指出这样做违反了在船上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朱栋却在第二天亲自在黑板上写出“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在风庆轮快到新加坡时，顾文广同志利用总结支部工作的机会，就黑板报问题再次提出质问时，朱栋恼羞成怒，跳了起来，拍着桌子说：“你们的问题现在不说，到上海再给你们弄清楚。”

实际上，当时朱栋已经布置人把平时监视李国堂、顾文广的记录，假借群众来信的名义整成诬告材料。

后来才知道，当时接受监视任务的至少有4人。诬告材料共罗列8大问题，54条，共万余字。其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且许多都是歪曲事实的污蔑不实之词。

这些材料将被用来作为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的炮弹。

四、风庆轮事件的高潮

风庆轮事件从 1974 年初揭开序幕之后，伴随着该轮远航，斗争也从上海转移到了大洋上。直至返沪，斗争已持续达 9 个月之久。

不过，风庆轮事件的高潮还在后头。

“四人帮”必须要选择一个最重要的时机才向最高层抛出这张“王牌”。

时机终于到来。

风庆轮返抵上海港时正逢 1974 年国庆 25 周年前夕。当时，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这是“四人帮”篡夺政权能否得逞的关键时刻。

9 月 30 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倾巢出动，借欢迎风庆轮胜利荣归的名义，向中央、国务院、交通部示威，抢尽了远航头功的风头。当时，朱栋迫不及待地吧诬告陷害李、顾的材料交给了《解放日报》记者，并交代说：“请赶快转交市委，是很重要的问题。”

《解放日报》立即以党委办公室名义编了简报，题目是：《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群众来信揭发副政委李国堂的错误言行》，还附上朱栋炮制的所谓群众来信。

“四人帮”的上海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见到了材料后说：“是交通部派来搞破坏的，是特务。”于是，这份

材料很快送到北京。姚文元看后立即批交新华社登《国内动态清样》。这样，“四人帮”就可以把事情闹到政治局去了。

国庆 25 周年纪念活动很快就过去了。10 月 4 日，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他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因病住进医院已经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

当晚 8 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指示。这个消息对“四人帮”组阁阴谋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野心勃勃的“四人帮”必然要制造事端反对毛泽东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而所谓风庆轮问题，这时便成了他们认为已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于是“四人帮”一个接一个赤膊上阵，把这个问题闹到了最高层。

“四人帮”首先借 10 月 13 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诬告李国堂、顾文广的材料大做批判文章，把问题闹到政治局委员面前。

10 月 14 日，江青首先写了以下一大篇批示：

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导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

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也批了下面一段话：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三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告中央。

张春桥批了以下一段话：

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路线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姚文元当然表示同意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意见。接下去他还写了下面一段：

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迷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以上文件经政治局传阅后,退给江青。江青于10月25日再作批示如下:

总理、康老:

这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现送上请阅。

退江青

周总理批示:已阅。

康生则于10月26日批了下面的话:

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桥、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应该说明的是,江青说的“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是指毛主席已经“圈阅”。也就是在名字上划过圆圈了。

当时,邓小平也圈阅了上述传阅件。但是,“四人帮”绝不让邓小平以圈阅了事。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在会议末尾,江青蓄意挑衅,责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这时,李先念就把邓小平劝走了。可是,张春桥却心怀叵测地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散会后,江青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钓鱼台17号楼密谋对策。江青对张、王、姚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

态。邓小平不支持新生事物。风庆轮船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当晚，“四人帮”密谋决定让王洪文抢在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前，先到长沙去告状。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瞒着周恩来等在京主要领导人，乘专机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接他到毛泽东处。

王洪文恶人先告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实际上是“四人帮”正如当年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那样搞阴谋）。王洪文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江青与邓小平意见分歧有关。”王洪文还想说风庆轮问题，当即被毛泽东叉开了。当王洪文讲到叶剑英利用矛盾挑拨他和江青的关系时，毛泽东却向他提问国内经济形势情况。王洪文见毛泽东对他想讲下去的事没有兴趣，只好把政治局讨论过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名单交给毛泽东，同时提出：董必武、朱德谁当委员长？毛泽东没有表态，随即把名单退给了王洪文。

最后，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形势比人强。不久后的事实说明，王洪文长沙之行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但却被毛泽东发现了“四人帮”的组阁企图。

江青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切等待王洪文告状的结果。但是，江青毕竟做贼心虚，她唯恐王洪文此行难以如愿。10月18日中午，江青迫不及待地把手海容、唐闻生召到钓鱼台17号楼。这是因为王、唐两同志即将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要王、唐把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他们国务院那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并让王、唐在当晚9时再来钓鱼台见她。

10月18日晚，王洪文回到北京当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他的长沙之行。

在王洪文长沙碰壁的情况下，“四人帮”一起会见如约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唱主角的是张春桥，他首先说：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接着，张春桥还诽谤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由国务院领导人“崇洋迷外”造成的。江青再次让王、唐把这些情况报告毛主席。

10月19日，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找到305医院。周总理对他们讲了政治局会议的真实情况。指出：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忍了很久了。看来，他们是事先计划好的。周总理还说，已告邓小平“这次陪外宾见主席时不要为此事干扰主席，回来后慢慢解决。”周总理问王、唐：这次你们去长沙有没有向主席

汇报此事的任务？王、唐两同志回答说：我们没有接受这方面的任务。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人帮”及周总理同他们谈话的全部情况。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毛泽东让王、唐两同志带话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着江青批文件，不要江青批一个，他们也跟着批一个，否则，其他人不好办。毛泽东还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是对“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粉碎性打击。尽管“四人帮”并未就此罢休，但已经步步被动、次次挨批。他们只能利用上海这个阵地继续捣乱了。

五、风庆轮事件的落幕及问题的实质

风庆轮事件的落幕，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对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的批判和处理；朱栋进入“四人帮”组阁名单及其结局；上海的舆论攻势及其落幕。

在王洪文的指令下，李、顾被扣留上海，并从10月15日起接受批斗。在此后一个月內，他们被200人参加的大会批斗3次；被10人至20人参加的小会批斗22次。加给他们的罪名有“假洋鬼子”、“洋奴”、“汉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交通部派来的特务”、“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攻击中央首长”（指对“四人帮”）等等。在批斗期

间,强迫李、顾交出了文件和工作笔记本,查抄了他们的房间,规定不准他们写材料上报,还在房门口暗设了看守人员。

11月14日,李、顾被押解回北京。第二天,远洋运输总公司宣布:李国堂停职审查、交代问题、接受批判;顾文广回宣传处交待问题、暂不工作、接受批判。回京后接受大会批判2次,小会批判3次。直到事隔3年以后的1977年10月7日,才在交通部党组直接过问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的正义斗争终于得到肯定的评价。

在李、顾遭到“四人帮”党羽迫害的日子里,风庆轮上的许多船员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安慰。例如,当组织者动员副水手长邬中由揭发李、顾时,邬中由明确回答:“对总公司派来的两位同志没有意见,他们在船上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我们是欢迎的。”在大、小批斗会上,邬中由就是一言不发,最后坚决要求提前公休,一走了之。有的船员抽空到李、顾房间说:“不要怕,要顶住”。也有的船员迫于形势不得不参加批判,却在半夜去敲李、顾房门,说:“明天又要批斗了,你们看我讲些什么比较好?”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当李、顾遭受诬陷批斗之时,害人者朱栋却被列入“四人帮”的组阁名单。在上海党羽密谋上报组阁名单时,马天水提出:“要派人到交通部去。”黄涛说:“就是要派人到交通部掺沙子。”王秀珍则说:“朱栋在风庆轮与李国堂斗争表现很好,让朱栋去。”马天水、黄涛都说:“他和交通部斗争有经验了”,“他到交通部能起作用。”于是,朱栋就成了“四人帮”组阁名单中的16个部长之一。不过,随着

他们组阁阴谋的破产，篡夺交通部大权的梦想也成了一枕黄粱。

1974年10月到11月间，“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挑起风庆轮事件时，上海党羽也卖力地展开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成套宣传”攻势。他们组织朱栋等人四处作报告达上百个场次；组织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迷外”的“卖国主义”；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

在此之前，文化部的“四人帮”死党还打紧急电话令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年内拍一部风庆轮问题的电影，并作为文化部直接抓的“重点片”之一。徐景贤授意他的秘书赶到上影厂文学剧本创作组交底说：“风庆轮要重点搞”，“这个题材如一般地反对崇洋迷外就搞偏了”，“这个剧本要敢于触及中央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要写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走资派。”“剧本的主题是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不能只反贪官，不反修正主义的皇帝。”此事后来未见下文。

在报纸宣传方面，由徐景贤、朱永嘉直接指挥，在1974年10月至11月两个月内，《文汇报》共发44篇文章（其中有9个是整版）；《解放日报》共用20个版，发表各类文章66篇（其中有画8幅），共约13万字。上海两报使尽浑身解数，既有通讯报导，也有评论、访问记、座谈会纪要，还有照片、图片、杂文、小说，他们称之为“全套宣传”，“连锁宣传”。上海两报的这种超大规模的举动，在上海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而且流毒全国。

“四人帮”及其党羽所以要这样兴师动众，朱永嘉有

个说法：“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因此，“风庆轮的问题要把文章做足”，“要一直宣传到四届人大的召开。”

朱永嘉视为重大无比的所谓路线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在前面提到的关于风庆轮事件的背景时，已经接触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党中央、国务院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通过国际经济往来和扩大外贸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决策本是利国利民之举，也是符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国策的。

邓小平正是在这个关系国策大计的问题上挺身而出与“四人帮”进行面对面的抗争的。这种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第一，就风庆轮事件本身而论，这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出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他们使用的手段，无非是歪曲事实，编造虚假情节以混淆视听。他们不仅借风庆轮制造假象，还公然伪造历史，于4月20日在《朝霞》第4期登了一篇《李鸿章出洋》。该文编造了李鸿章出洋购买洋船洋舰的情节，以此影射攻击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领导人“崇洋迷外”。而且威胁说：“如果执迷不悟，甘当洋人走狗，定必严惩不贷。”这些捣鬼伎俩虽然可以蒙骗不明真相的人于一时，但是许多领导同志却洞若观火，因为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以至后来毛泽东也赞赏说，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得好。

第二，“四人帮”当时所以能够借买船大做文章，把买

船同“洋奴哲学”、“崇洋迷外”、“爬行主义”、“卖国主义”等等罪名划上等号，大批特批，这是与泛滥全社会的极左思潮有密切关系的。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我们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建国初期，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想对外开放的，只不过限于当时国际环境，美国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我们只能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后来由于客观情况变化，也由于我们主观上陷入“左”倾错误，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我国一度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搞建设，使我们错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丧失了使我国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的良机。到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我国实行了扩大外贸进出口的政策，这本是审时度势后的正确决策，但是“四人帮”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掀起了这股反对进口的恶浪。这只能说明他们除了玩弄政治阴谋之外，对社会发展规律实在一窍不通。他们既无视我国从明、清以来数百年闭关锁国造成贫穷落后的教训；更不懂世界已进入开放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间的交往是不行的。如果按照“四人帮”的主张行事，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所以说，“四人帮”的愚蠢无知实属世界之最。

在“风庆轮事件”这一实质上涉及是实行对外开放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原则性斗争中，邓小平同志不但对“四人帮”采取了不妥协态度，在他随后领导的1975年整顿工作中，更针对“四人帮”所搞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政策，明确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强调说“这

是一个大政策”。后来，邓小平还说过：“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今天，风庆轮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却仍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今，经济开放政策已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结出丰硕的果实。

耀邦同志在湘潭

唐 非

(一)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选派一批领导干部下放，去加强地县委的领导工作，胡耀邦同志被派往湖南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当时湘潭地区同全省、全国一样，刚刚经历一场严重困难，正处在调整时期。人民群众渴望建设家园，要求切实落实关于恢复生产的各项政策；干部们有的疑虑较多，工作措施也一时跟不上。前一时期在生产上和心理上留下的后遗症，对打开局面是不小的障碍。耀邦同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湘潭的。

11月间，耀邦同志到省委报到，他以谦虚的态度向省委领导同志请教，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他坦诚地表示，自己已多年不做地方工作，今后工作中一希望省委经常指点，二依靠广大干部，三依靠人民群众，这样就有信心做好工作。其时恰值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来湖南视察，耀邦同志到蓉园拜望了陶铸同志。陶铸说，湘潭地区粮食生产潜力很大，只要粮食打上去，人心就会稳定。他又说，振奋干部精神，改进干部作风是一件大事。一个是人，一个是

物,这两者互相促进。他还建议耀邦同志要“从容不迫”。耀邦同志很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回来以后赞佩地说,陶铸同志敏锐啊!就这样,在听取各级领导意见之后,他开始在湘潭展开工作,前后为时两年。

湘潭地委机关干部久闻耀邦同志大名,听说他要到这里来当第一书记,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有些同志又有顾虑,不知他对这里前一段的工作作何评价。耀邦同志到任以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第一件事就是做机关干部的工作。他充分肯定了湘潭的工作,指出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偏差,不要背包袱,他愿意同大家一道鼓起劲来干。他热情洋溢的语言和诚恳的态度,一下子缩短了作为新来的第一书记同原有干部之间的距离,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在经过找干部谈话、阅读有关文件之后,在地委没呆多久,耀邦同志就到各县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湘潭所辖十四县一市,北起临湘,南到酃县(即今炎陵县),相距七八百里。从湖区到山区,耀邦同志风尘仆仆,一个个县,甚至一个个公社、一个个大队地跑。每到一地,他独自听取干部汇报,同时把秘书和警卫员都派下去,直接找群众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回来同干部的汇报相印证。他自己也时常同群众直接攀谈。有时在路上遇到群众,他会跳下车来,走到群众中去,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无论同干部还是同群众谈话,他都认真作笔记。他有深思的习惯,坐在车上常常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对于各种情况的思考中。有时候兴致上来,也同身边工作人员们议论,听取他们对一些情况的看法。他同时也细心

观察,走到哪里都注意庄稼的长势,人们的衣着、脸色甚至神情,从中作出分析判断。他在干部和群众中没有架子,甚至有种特殊的精神抖擞、活力充盈的魅力,能够使人们受到强烈感染。交谈当中,他提出一个个题目,引发大家思考、争辩;他提出各种方案,要大家比较、选择;他风趣的谈吐常常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使得最老实的农民也消除了拘谨感,极自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意愿。他一路奔波,走到哪里就住哪里。农村有些地方条件还很差,土壁纸窗,甚至没有电灯。但他对这些毫不在意,总是兴致勃勃地邀人来谈情况,研究问题,直到深夜。就这样,北边跑了5个县,略事休息,南边又跑了5个县,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跑遍了整个湘潭地区的大部分区乡。

耀邦同志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并同地委同志统一了认识后,着手制定各项工作措施。他以很大精力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分析形势,指出有利和不利条件,鼓励大家总结经验,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他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着手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落实自留地政策等。他了解到农民群众恢复生产时耕牛不足、资金短缺甚至负债,就同有关部门商量设法扶植。他在各处都因地制宜提出一些开辟生产门路的措施,提倡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几乎在每次干部会上,耀邦同志都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克服瞎指挥,尊重群众种植意愿。他发现岳阳的茅田是个好典型,干部作风艰苦深入,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改变贫困面貌很快,立即帮助总结经验,向全地区推广。后来茅田经验推广到全国,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他还用“电话通讯”这种方式,及时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和一些想法向全区各地通气。经过艰苦努力,各地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63年5月间,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耀邦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着重讲了农村阶级斗争和农村干部教育问题。耀邦同志回到湖南后作了很认真的传达。此后一个时期,他的工作就转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这次运动触及到基层干部一些作风问题,耀邦同志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反复强调既要认真严肃,又不要搞过火斗争,伤害干部。他认为,清理干部的贪污腐化、强迫命令极为重要,要认真进行,但归根到底要着眼于教育广大干部,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因此他每到一处,总是通俗浅显地宣传那些贪污腐化行为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会危及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安全。他还运用农民群众的比喻说,现在粮仓里有了老鼠,不打能行吗?同时,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帮助有问题的干部“洗温水澡”,尽可能使他们既洗掉身上的污泥浊垢,又不至烫伤起不来;经济上退赔要干净,但确实愿意悔改而一次退不出的,可以分期退。他说,基层干部大多是劳动农民,他们犯错误主要是教育不够,我们也有责任。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二)

在湘潭期间,耀邦同志始终保持着他固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而且由于身处基层,这种作风显现出更加朴实和深刻的特色。

他喜欢直接到群众中间去。他对群众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情,没有那种“首长”的优越感。他待人亲切,跟不同层次的群众都有广泛的话题,而且善于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跟干部谈工作,他往往提出很系统的见解,一二三四地层层深入,特别是常常运用数字算帐说明问题。跟知识分子谈话,他善于抓住和阐述一些重要观点,同时广征博引,也时而对某一传统观点提出自己看法同大家商榷,他的思维活力和思想深度能令满座受到感染和启发。跟农民谈话,他往往围绕一定主题多方设问,结果是大家议论纷纷,热闹非凡。对群众一些好的意见,好的语言,他会牢牢记住,不但付诸实施,而且会作为精辟之词不断引用。耀邦同志的心,同群众是相通的。

1963年春天,他来到浏阳,听说老艺人们正在县里开会,并且了解到老艺人们或是由于历次运动中被审查,或是由于生活清苦而情绪低落。他于是径直去同这些老艺人们见面。一开头他就引了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乐师,杜甫又恰好同他在潭州相遇,有他乡知己之感。他刚一吟罢,大家立即鼓起掌来,气氛顿时轻松而亲切。有的老艺人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竟这么随和。

还有一次,已记不得是在哪个县,适逢农历九月九日,他邀请了县城里70岁以上老人来,开了个“敬老会”。一见面,他就向老人们深深鞠一躬,为老人们祝寿。然后他发表了讲话,要求整个社会继承中华民族的尊老传统,同时他还征求老人们对县里工作的意见。老人们都被他

的真诚和热情所深深感动，大家畅所欲言，尽欢而散。

在湘潭县中路铺，小学生们听说他来了，都想见“胡伯伯”。他欣然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跟孩子们“畅谈”起来。他向孩子们提出许多问题：你们长大要干什么呀？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大吗？等等，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启发孩子从小就要有志气，有理想。孩子们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极了，回答非常踊跃。他跟孩子们也有共同语言，也能够相互交流。

耀邦同志无论到了哪里，要求见他的人都很多。他们有的反映情况，有的倾诉冤情，有的出于仰慕而来求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他能抽出身来，他都要会见，耐心听取他们的陈述。如果他没有时间，也一定让秘书接待，记下来向他汇报。一次，在平江县某个公社，天已经很晚了，耀邦同志正同身边人员研究工作。突然警卫员来报有人求见，话还没说完，那人已经闯进来了，须发脏乱，衣衫褴褛，进来就问哪位是胡书记。耀邦同志让他挨近自己坐下，问他什么事。那人词不达意，说了半天没说清是什么事，但耀邦同志一直认真听着，弄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一桩债务纠纷。耀邦同志和颜悦色地劝导他，并且答应请公社调查，帮他解决。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布置给了公社。

耀邦同志真诚待人，不矫情，不虚饰，闻善则喜，闻不善则争辩，但不是训斥或乱扣帽子。因此，下边的人也敢于同他争论。如果他觉得对方确有道理，是自己不对，就会从争论时的激动状态迅速平静下来，甚至高兴地笑起来赞许。即使别人对他唐突、冒犯、甚至顶撞，他也并不在意。一次他向身边一名工作人员布置一件任务，那位同志

不同意他的意见，两不相让，争执起来，那位同志控制不住，竟对他拍案大叫，他也盛怒拂袖而去。过了一会儿，他却又折回来，和解地说：同志啊，你急什么嘛，我们再商量一下。这使得那位同志深为感动。他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作风，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夏天，他见秘书起草文稿时热得难熬，会拿了扇子来给秘书搨。如果发现工作人员做事不认真，他也很尖锐地提出批评。

1962年冬，耀邦同志来到浏阳。他阔别家乡已经30多年了，此番归来，他吟哦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感触良多。一到县里，他就急急打听故旧师友，特别是在县中学教过他的教师，可惜多已谢世或移居他乡，令他不胜感叹歔歔。在文家市，他听说一位中学教师生活极为困难，他立即拿出自己的收入，去解这位教师的燃眉之急。对自己家里，他却要求很严。春节时期，他乘便回了一趟家。他哥嫂生活清苦，希望他能有所资助。他只给了很少一点钱说，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解决，确实解决不了，就找当地政府，但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三)

耀邦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和青年工作，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到湘潭后，他也同样如此。每次部署工作，都要把思想工作考虑进去。那时候仍处在困难时期，他每次对干部讲话，几乎都要分析国家形势，讲明前途，号召大家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他说，现在有些老百姓骂娘，不要一股脑儿地批评人家，要看到我们的工作确有缺

点和错误。他又讲到,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咬紧牙关,坚定不移,硬是挺过来;一种是被困难吓倒,那就完了。他多次谈到一个例子:在长征中,过雪山时有一座大雪山叫梦笔山。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一个很要好的战友已经疲惫不堪,觉得这座山难以攀越,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掏枪自杀了。其实这座山爬过去,后面的路就好走多了。他说,这个战友的事情给他的震动很大,触动也很深,使他一直记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他鼓励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信心和前进的勇气,世界上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了解到有些干部由于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有委屈情绪,便对大家说,革命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有时整人,有时挨整,常常身不由己。整了人的要总结教训,以后尽量实事求是;挨了整的也不必委屈,要向前看,更不能记仇。他说在延安整风时也有人批他,要凑几大罪状,实在凑不齐,因为他姓胡,就凑了一条“糊涂主义”。给他扣帽子的同志后来见到他时很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

针对一些基层干部常常就生产论生产,开起会来只报生产数字,下乡工作只派任务而不讲清道理的状况,耀邦同志强调“虚实结合”,开会要谈观点,下乡要讲道理。他说,同样一件事情,对老百姓讲清道理,这叫作启发开窍。如果生搬硬派,就可能是强迫命令。虽然都可以完成任务,在群众里的影响却大不一样。

初次到南五县时,耀邦同志来到茶陵,这里与江西省永新县毗邻。耀邦同志少年时参加革命,曾在设于永新的少共国际师工作过。陪同他一道来的地委第二书记华国

锋同志知道这情况,提议他去永新看看,还可以上一次井冈山。耀邦同志也有这个愿望。于是跨过界化陇,来到永新县。一别30余年,旧地重返,耀邦同志感慨万分。他向大家讲述任弼时同志在这里工作时的情景,讲述当年同国民党的战斗。随后,又到了井冈山。他虔敬而兴奋地参观一处处革命旧址,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在黄洋界,他兴致勃勃地吟咏了《西江月·井冈山》,看了朱德同志担米歇息处。在茅坪毛主席故居外面,有一块大石头,据说当年毛主席常常坐在这里读书,耀邦同志于是坐在这里让人拍张照,就是要补上井冈山这一课。这次井冈山之行,使他思绪万千。下山之后,他在几处给干部作报告,都谈到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他说,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那么多那么好的传统,是教育人民和青年的极好的精神财富。别的可以丢,马列主义不能丢,革命传统不能丢。他说,井冈山的传统之一,就是同群众密切联系,鱼水之情,而这几年来恰恰是这个观念淡薄了,许多错误都来自于此。他同时也强调了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一直到回到地委,他还多次谈到这次井冈山之行。

耀邦同志虽然下放到地方工作,但他对青少年工作仍然十分关注。1963年,雷锋的事迹在报上发表,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耀邦同志认为雷锋是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典型,毛主席的号召具有深远意义,青年团应该迅速响应毛主席号召,以雷锋为榜样,对全国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于是他立意撰写一篇文章,论述他对雷锋这个典型的认识以及如何向雷锋学习。那时候他正忙于下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仍抓紧时间认真思考,很

快有了整体构思。经过几易其稿，写成了题为《把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提到新的高度——谈广泛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深远意义》的文章。文章里他热情颂扬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批判了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思想。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

(四)

耀邦同志的勤奋学习精神是许多人都知道并深为钦佩的。少年时他只读到初中就参加了革命，在几十年斗争生涯中，他正是以刻苦的学习和思考，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素养，积累广博知识。在湘潭期间，只要空下来，他就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读书时精神非常集中，在重要地方画上线。打开他读过的书，可以看到从头到尾都有红线标记，说明他读得用心并从不中途而辍。到外地出差，他也要带一大批书，有空就读。而且每到一地，他还觅寻当地典籍，津津阅读，甚至吟咏背诵。初去岳阳，渡汨罗江时，他在船上背起了《岳阳楼记》，意思基本无错。在酃县下乡，路过炎帝陵，找了一堆有关炎帝的材料阅读。求知中遇有疑难，他一定设法弄通，决不含糊过去。杭州会议上，有一次毛主席讲到哲学家，列举了王充、范缜等人，其中还提到一个“傅奕”。耀邦同志回到湖南整理笔记准备传达时，起先把这个“傅奕”当作了东汉的傅毅。但转面一想，傅毅是文史学家，会不会另外还有个“傅毅”？他派人到省图书馆去查核，查到了“傅奕”，隋唐时人，无神论者，毛主席讲“傅奕”时，是放在王充之后，柳宗元之前，可见就是这个傅奕了。经过一番“考证”，弄清一个疑问，他非常高兴，还

特地给参加杭州会议的几个朋友写信，向大家作了介绍。

耀邦同志读书广泛而又重视系统攻读马列著作。他从北京运来全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地通读。在湘潭县楠竹山蹲点的时候，有几天空闲，他安排来专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几天他足不出户，除进餐和午休之外，整天整天兀坐不动，聚精会神，边读边画杠杠和作摘记。大家跟他开玩笑说，耀邦同志这样坐下去，头上要长草了。他感慨地说，光读有什么用，用不上还不是白读？要求学以致用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他总是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阐述事物，所以在新鲜感和理论色彩上，总有他独到之处。

耀邦同志十分注重从实际生活中、从生产实践学习。他思想敏锐，思考问题极认真，记忆力也特好，遇到什么新事物新知识马上捕捉和研究，加以吸收。一次一个学过农业的干部谈农业生产时，提到庄稼需要“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立即吸引了他。他详细询问其中都包括些什么，起什么作用。当时没有完全弄懂，回去又查了有关书籍，直到弄明白为止。在醴陵，听到汇报瓷器生产的“釉下彩”，他也饶有兴味地好一阵钻研，把每个细节都问了个一清二楚。

(五)

耀邦同志在湘潭地委工作两年，走遍了湘潭的山山水水。这里所记述的片断，远不能反映出耀邦同志当年的政绩、思想、作风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之情。斯人虽逝，遗泽长存。湘潭人民会永远纪念他、怀念他。

高君宇年谱

张思荣

1896年(诞生)

10月22日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

祖父高九重,幼时家贫,乡试中秀才。父亲高配天,未多读书,捐监生。曾教书兼行医,后在家乡经营油坊、酒坊、粉坊等作坊,货铺、面铺等店铺,商行、瓷窑、煤窑等企业,家境富有。政治上反专制,赞革新,曾入同盟会,充当温泉都团总,任县商会会长,为地方倚重。母亲赵氏是本县一农民女儿,没有读过书,性情温和,为人善厚,一生勤俭,精于理家。兄俊德,弟全德、宣德,妹志娴。君宇为二,出生后取名尚德,字锡三,君宇乃号。

1900—1902年(4岁—6岁)

高君宇幼时,聪明,好动,贪玩,有胆识。当时,义和团的故事在静乐流传很广,他敬慕这些英雄,常和孩子们玩义和团杀洋人的游戏。

1903—1908年(7—8岁)

君宇7岁开始读书,先由父亲高配天把他和大哥俊

德送到本村塾师段化行家接受启蒙教育。君宇在此读一年。后父亲在家设私塾，延聘本县静游村秀才冯善达教授君宇各种经书。不久他和大哥俊德又转到娄烦镇大户尹家私塾，尹家私塾聘用全县有名的冯乐善老先生教学，因冯教学有方，君宇“颖慧冠群儿”，读书肯用功，在这里学习一年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1909年(13岁)

同大哥俊德一起到静乐县立高等学堂读书。该学堂是静乐全县最高的官办学堂，当时已实行新学制，变打骂为训育。高君宇广泛阅读当时能见到的书刊，开始接触到社会问题和新的思想。

1911年(15岁)

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山西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静乐地方也响应革命，高君宇父亲高配天参与其事，并且担任新政权的重要成员温泉都团总，负责组织民团，维持地方秩序。高君宇当时在静乐县立高等学堂读书，受到父亲和辛亥革命的影响，和父兄一起，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他反对残忍的封建陋俗，坚决反对女子缠足，背着母亲给妹妹放足。

这年，高君宇在父母的包办下，被迫与李寒心成婚。婚后大病，借故移地静养，不复归，要求父亲释放此可怜女子。

1912年(16岁)

1月23日 考入太原模范中学校编入第八班,高君宇读书用功,成绩突出,期末得优等奖品。

1913年(17岁)

7月 太原模范中学正式命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改为秋季始业,面向全省招生,高君宇编入第八班。

1914年(18岁)

同学梁汝舟、王怀奇、邱仰浚等在学校组织了学生“敬乐会”,是敬业乐群之意,名义上是互励互学,实际是为阎锡山拉拢势力,征求高君宇加入,被拒绝。

校长王襄根据老师的考察评比,从全校挑选出18名拔尖学生,登在学校办的壁报上,名为《十八学士登瀛洲》。高君宇为十八“学士”之一。学校给他的评语是“崇德敦行”。

1915年(19岁)

5月 省立一中师生得知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时,高君宇“目击时艰,痛国沉沦,辄愤懑填胸”,迅即和同学们发动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并附注释,分别在学校和街头散发,揭露袁氏

卖国丑行。

12月 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讨袁。消息传到太原，高君宇和一批同学走上街头宣传反袁。他还将《袁氏窃国记》寄回家乡让父兄看，还写信告诉父兄“洪宪过不了百日”。

1916年(20岁)

7月 高君宇参加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考试，从省立一中毕业。毕业时，高君宇本想报考山西大学，但英语老师朱海洲劝他，山西大学学风落后，建议他投考北京大学。高君宇遂在父亲高配天陪同下，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后被录取为北京大学理预科新生。

9月 高君宇正式进入北京大学读书，被编在理预科甲班。

1917年(21岁)

夏 高君宇升入北大理预科二年级学习，受北大新文化、新思潮氛围的影响，“求学之余，兼留意政治”，经常借阅英、德文哲学书等西方书刊，着意了解西方政治思想文化。

1918年(22岁)

5月21日 为反对日本政府和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和北京学生共

同发起请愿活动。高君宇参加了这天的活动。他们要求政府不在协定上签字并公布协定条文，总统秘书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转递学生请愿书，学生便解散回校。

7月初 北京大学放暑假，高君宇从京回到静乐家中度假。

8月11日 高君宇致信校进德会申请入会，并说明除遵守该会基本三戒则外，并愿守不吸烟，不饮酒二则。

9月初 暑假期满，高君宇回到北京大学。

同年 高君宇加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1919年(23岁)

2月初 高君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

4月 高君宇开始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每周听讲新闻理论三至五次，先后听过李大钊、邵飘萍等人讲课，经常撰写新闻稿件和编办报刊。

5月3日 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日本，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晚，北京大学和北京各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参加大会。

5月4日 下午，高君宇和北京大学同学及北京各校同学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简短集会，宣读学界宣言后进行爱国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首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改道直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铁门紧锁、军警把门。高君宇和几个同学翻墙越院，打开大门，同学一齐冲了进去，搜查不见曹汝霖，偶遇另一卖国贼章宗祥，高君宇和十余同学将章痛打，火烧赵家楼。

5月6日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和邓中夏担任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奔走呼号,久而愈烈,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呕血者二次。”

夏 高君宇到太原发动学生,联络同志,组织山西学生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为唤醒晋民,改造社会,反对阎锡山的专制统治,高君宇还指导王振翼等人创办了《平民周刊》杂志。

9月21日 高君宇开始到北京手帕胡同教育部听美国哲学家杜威讲《教育哲学》,前后16次,并做笔记,日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刊登12次。

10月16日 高君宇出席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届会员期满式,和毛泽东等32人领到听讲半年期满证书。

10月21日 高君宇加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10月26日 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召开成立大会,高君宇担任评议部评议员。

11月中旬 高君宇加入北京大学新潮社。

11月19日 新潮社改选职员,高君宇担任广告干事。

11月20日 高君宇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大会,当选评议部总务委员。

11月23日 高君宇参加旅京晋学会讲演会,日后将听讲笔记分两期刊在《晨报》上。

12月17日 高君宇参加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应邀到会的杜威博士讲演《大学与民治国舆论

的重要》。20日,《晨报》刊登高君宇听讲笔记。

年底 高君宇访见杜威,借阅杜威在北大纪念日大会讲演稿及笔记,又将他在该纪念日大会听讲笔记增修,重新刊登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至三号上。

同年 高君宇参加国民杂志社,担任该社编辑。

1920年(24岁)

1月 陈独秀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组稿,嘱高君宇托人调查山西劳动状况。为此,高君宇托在太原的朋友续约斋等调查山西劳动状况。续约斋接高函后用十余天时间遍访太原各工厂老年工人和手工业者,写成一篇详稿寄去。

2月上旬 高君宇因事离京。

3月1日 高君宇撰写《我们为什么反对直接交涉》一文。日本根据巴黎和会对德和约,向中国发出通牒,要中国把德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北洋政府主张和日本直接交涉此事,而高君宇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公决。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该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因此日本的要求没有法理依据,所谓直接交涉也就没有法理依据了。

3月 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何孟雄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为当时当权者嫉视马克思主义,指责其“过激”,视其若“洪水猛兽”,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干扰和非议,研究会暂时保持秘密状态。

3月14日 高君宇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全体团员大

会。根据李大钊到农村去的主张，会议决定除开展城市讲演外，还要注重农村讲演。会议改选职员，高君宇担任文牍干事。

春 高君宇和范鸿劼等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室英文组的工作，担任英文组负责人。

4月24日 高君宇撰写《“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一文，追述“五·一”历史，抨击当时社会不合理现象，描述了一幅劳动阶级希望的未來社会蓝图及实现蓝图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法。

5月1日 高君宇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山西省劳动状况》一文。

春 高君宇和罗章龙二人介绍在晋之王振翼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通讯会员”。

5月13日 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到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高君宇的讲题是《“人”的生活》。这次讲演，一开始就受到警察的无理阻挠。

夏 利用暑假回乡机会，高君宇在太原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等人座谈，他针对当时社会思潮和山西的实际情况，谈了他的认识，诸如无政府主义问题等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这些问题。

8月1日 高君宇发表《解决时局的我见》一文。主张要把解决时局问题做为彻底解决假民主、假共和、彻底改造社会的良好契机。他主张惩办安福派、裁兵、废督、实行地方自治、筹办教育基金、恢复人民三大自由，“为德莫克拉西之安全而战”。

8月8日 高君宇撰写《时局的解决与学生》一文，赞

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直皖战后时局，但不主张学生充当代表，而要学生当个强有力的监督者。

8月20日 高君宇代表北京学联访问美国议员团。

同日 高君宇代表北京学联和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座谈，在座谈会上发言。

9月2日 高君宇撰写《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说明他之所以主张举行国民大会，第一想借举行国民大会对老百姓进行民主教育，把“民主国主权在民”的观点传到老百姓脑中；第二可树立一个和恶势力斗争的榜样，可“打破”一般老百姓怕困难的“劣性”，给以后和恶势力斗争以鼓舞和启示。

9月 高君宇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草拟关于举行国民大会的意见。

9月15日 高君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入该会理科。

10月11日 高君宇加入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

10月28日 新潮社选举编辑部、干事部，高君宇再次被推为干事，这是新潮社第三届职员。

11月14日 高君宇在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什么叫做“自治”？他的意义、形式和功能》。

11月28日 高君宇在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私产制度和婚姻》。

11月 高君宇和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等40余人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1月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北京在10月间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于11月初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2月29日 高君宇和邓中夏请周作人到少年中国学会讲演《宗教问题》,这段时间,周作人先后到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三次,均由高君宇和邓中夏约请。

同年 高君宇和石评梅在山西同乡会相识。此后他们互相通信,石向高倾吐个人苦闷,高即鼓励她投入社会改造去解决个人苦闷问题。高君宇对石评梅以后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活动产生很大影响。

1921年(25岁)

年初 高君宇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全体成员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座谈共产主义有关问题。

3月16日 高君宇主持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会议,李大钊、何孟雄、罗章龙等24人出席,高君宇报告了和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接触情况。根据格林意见,会议当即选举何孟雄为代表,参加4月25日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少年共产党会议。

3月中下旬 高君宇等审查通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

3月22日 高君宇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范鸿劫、朱务善等人研究起草并签署《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提到学习进行计划,已有十九人参加,已筹集到一点购书费,已购买《马克思全集》英德法文本各一套,已找到一个事务所,可供藏书、阅

览、开会、讨论用，并已拟定几条规约。《启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后因故未登。

3月30日 高君宇和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出席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会议，根据青年团工作发展情况，会议决议将旧之四股制改为委员制，高君宇被推选为组织委员，李大钊为出版委员，委员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月开大会一次。

4月16日 高君宇给石评梅写信，根据石评梅在通信中流露出苦闷心情，即“说不出的悲哀”，高说这是社会给青年的普遍心理感受。高认为，既然社会总给青年烦闷和悲哀，那么这个世界“是应该换过了”，所以高又说“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我决心走我的路了”。他并鼓励石评梅起来“粉碎这些桎梏”，“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

4月24日 高君宇和李大钊等16人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讨论修改团的章程，纪念五一劳动节及五月一日长辛店工团成立大会派人到会讲演事宜，又决定设五一运动委员会，选举高君宇、罗章龙等7人担任委员，筹备纪念五一有关活动。

6月 《工人周刊》创刊，高君宇担任编辑，在《工人周刊》社下，还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除采集新闻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发稿，高君宇也是该社成员之一。

7月1日 高君宇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会议主要讨论李大钊在北京总会提出的用主义指导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问题。因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等

北京总会左翼会员尚未到会，高君宇估计到右翼会员对于把主义做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指导思想阻力较大，难以通过，故当即提出动议，与次日议程互换。这天讨论月刊和研究会问题。会上高君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所属社会学研究会、生物学研究会和地质学研究会。

7月2日 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左舜生主持会议，高君宇参加。会议讨论宗旨主义问题和政治活动问题。参加会议的会员对所讨论问题认识不一，争辩激烈，气氛紧张。左舜生说，“学者即不谈主义”。高君宇起来争道：“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邓中夏、刘仁静等亦发言，力主学会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终因右翼会员反对而没有获得通过。

7月3日 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举行第三次大会，邓中夏担任会议主席主持大会，高君宇担任大会书记。会议讨论宗教问题，会上有的会员主张宗教徒也可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高君宇不同意这种意见。这和他主张学会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会是科学团体的认识是一致的。

7月中上旬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结束后，高君宇和刘仁静等一起赴上海。

7月24日 高君宇在《民国日报》发表《随感录》《“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里？》，针对罗素《中国人的到自由之路》一文，批评罗讲社会主义是假，赞成资本主义共管中国是真，说罗素指给中国人到自由的路是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中国人的一条难于识别的道路。

8月初 高君宇和刘仁静从上海到杭州，遇毛泽东。

8月中上旬 高君宇返北京。

夏 高君宇委托王昉帮助太原团组织创办晋华书社,发行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

10月 高君宇指导王振翼、贺昌、刘廷英等创办青年学会。高在京、沪等地经常为青年学会筹集经费,采买图书,指导和帮助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

11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高君宇等19人签名的《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把本年3月22日已起草的《启事》正式公布。至此,成立并活动已一年多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公开团体。

11月18日 高君宇参加中共北方区委紧急会议。李大钊主持会议,讨论对11月17日爆发的陇海路工人大罢工的援助办法。因陇海路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会组织,党团力量也很薄弱,究竟如何支援?参加会议者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一篇援助罢工宣言,以后看情况再采取其它对策。高君宇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陇海路政治形势不宜于采取这种宣传方式,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了解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参加会议者的意见逐渐统一到高君宇的认识上来,决定由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人去领导这一次罢工斗争。

11月下旬 高君宇和中国共产党及各革命团体代表共54人赴俄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高与部分代表由东北进入俄境。

12月 少年中国学会公布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调查表中高君宇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为“地质学、生物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为“中国地质及生物分布的调查和著述或

平民教育”。

同年 高君宇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经常到长辛店给工人劳动补习学校讲课，帮助俱乐部工作。工人起初称他们为“先生”，相熟后，竟以绰号称呼。高君宇举止斯文，工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

1922年(26岁)

1月中旬 高君宇等中国代表团一行人到达莫斯科。

1月21日 高君宇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主持会议，推选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中国代表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被大会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

1月30日—2月1日 高君宇及中国青年共29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研究讨论了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的任务等问题。会议通过《远东革命少年会议宣言》。

2月2日 高君宇参加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闭幕会。会议宣读并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高君宇等中国执委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会后，高君宇及部分代表又留俄数日，继续与俄共、青年共产国际及各方人士接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实践。

2月27日 高君宇与部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签名

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成员有黎元洪、颜庆惠、蔡元培、王正廷、李大钊、胡适等共 173 人。是日，该会致信北大，请北大学生等为俄荒募捐。

3月9日 按照北京大学凡一学期授课逾三分之一而未交学费者即作休学论的校规，高君宇从北京大学休学，时为北大地质系三年级学生。

4月 高君宇由苏俄绕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国内。

同月 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高君宇和北京各界人士李大钊、邓中夏、陶孟和、谭熙鸿、高一涵等 200 多人发起非宗教运动。

春 高君宇到石评梅寓所看望。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施存统等 25 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纲、团章，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决议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决议案》等议案，并选举了团中央领导机构，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施存统等 5 人当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闭会不久，高君宇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

6月23日 高君宇在《民国日报》发表《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针对江亢虎 20 日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讲，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过程，苏俄革命成功并不等于实现了

共产主义,而是才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如共产党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论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问题。

7月2日 高君宇到杭州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讨论政治问题和主义问题。讨论上述问题时,高君宇发表如下意见:“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除反对军阀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

7月16日—23日 高君宇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大会出席代表12名;高君宇为北京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8月初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召开,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高君宇参加了会议。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最初包括高君宇在内的多数人不同意加入国民党。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加入进去改进这一政党以推动革命。李大钊支持马林意见。最后高君宇及与会者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原则决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主义原则实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此形式实现两党合作。会议还决定创办政治评论周刊,定名《向导》。会后,高君宇和蔡和森即着手筹备《向导》出刊事宜。

8月20日 为了探索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贯彻实行中

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高君宇和缪伯英、范鸿劫、蔡和森及部分党外人士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希望通过这一公开的组织，联络和团结党内外各方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完成党的二大提出的任务。

同日 民权运动大同盟召开筹备会议，高君宇担任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了组织名称、组织宗旨、组织事项，并推选高君宇、蔡和森、缪伯英、范鸿劫、刘仁静等人为筹备员。

8月24日 高君宇和李大钊等人出席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

9月3日 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杨贤江、沈雁冰等出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召开的纪念“国际少年日”大会。李大钊、高君宇等人就“国际少年日”的历史、外力与武人压迫等问题发表演讲。

同日 高君宇负责编辑的团中央刊物《先驱》出版。该刊发表高君宇署名澄宇的《少年工人和劳动立法》及未署名文《杂感》两文。文章指出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都是由于他们有政府做他的后援”，“所以我们应当觉悟，我们与资本家的斗争是政治的斗争。是在政权上拼你死我活的斗争。”劳动立法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在宪法上规定我们劳动者的利益。防遏资本家对于我们有过多的掠夺，便是为我们将来打倒资本家的初步”。“所以劳动立法是工人为自己利益奋斗的一个必经的关头。”

9月13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刊出。高君宇参加《向导》编辑工作。

9月14日 北京《晨报》刊登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君宇、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劼、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联名《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9月20日 高君宇在《向导》发表《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介绍印度几种革命势力。

9月27日 高君宇撰写《国人对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认为蒙古应该有自决的权利，而且也有决定他们命运的能力。高不同意收回蒙古，因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宰割，收回蒙古无异于给军阀多一块地盘，帝国主义多一块殖民地。中国收回蒙古，中蒙会合应在中国打倒军阀赶走国际帝国主义，建立真正共和国的时候。

同日 高君宇发表《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论述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国民军打败希腊这件事是被压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的胜利，这一胜利必将鼓舞埃及和印度等各个弱小民族反帝运动的发展，苏俄帮助基马尔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帮助他们解放的真正朋友。

10月4日 高君宇和张太雷合写《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介绍印度新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全印度中央革命委员会纲领，认为有压迫的事实存在“就决定要发生革命”，反之，没有压迫想造革命不可能，有了压迫想消灭革命的动力也不可能。革命要有组织，也要有领导者——先锋队。时下，中国已有弱小的领导力量（先锋队），但纲领不显明，还没有引起群众的兴趣。国民党改组，从新制定纲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同日 高君宇在《向导》发表答读者思顺《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一文，提到并论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国民革命为什么要联合资产阶级。高认为，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被压迫”，都有革命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独立去奋斗，目前的压迫非统一全国革命力量不能迅速成功，所以必须吸收一切革命势力共同奋斗；（二）和资产阶级联合以谁为主。高认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强壮，且他们“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在党史上，第一次提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基本形成；（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问题。高认为，无产阶级并不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解放他们的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会运用国民革命的经验，组织革命队伍，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成功。这里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问题；（四）联合战线中两阶级的关系问题。高认为两阶级联合并不是“工商友谊”，“劳资互助”，“大家滚和在一起”，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放松为自己阶级利益的斗争。

10月11日 高君宇发表《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指出日俄长春会议决裂，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态度和苏俄维护国家主权坚决态度不可调和的结果。提醒北洋政府认识中俄建立密切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世上只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

压迫,只有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从国内来说,要发展生产力,“不是要去欢迎新银行团的金钱资本,是需要借助于外国的机械和工业技术”,“现在世上能在这点上助中国而又站在平等地位的,又只有俄德两国。”

同日 高君宇发表《福建现下的局势与国民党》,劝告国民党不应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因为段、张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和他们“搅和”,有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形象。

10月29日 高君宇应邀参加女权运动同盟会上海支部成立会。

10月 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期间,为了影响和控制《晨报》言论,支援罢工斗争,高君宇、宋天放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参加《晨报》每周的专栏会议。在高君宇等努力下,《晨报》连续发表几篇支持罢工的社论,大量报导罢工消息,有力地支援了罢工斗争。

11月2日 高君宇在《向导》发表《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一文,表明对女权运动的态度:(一)妇女的附属地位是封建制度造成的,只有打倒私产制度,妇女才能完全解放;(二)妇女参政呼声是少数特权阶级妇女的争权活动,与妇女解放无关;(三)如果女权运动的目的是在改变妇女的附属地位,就不能只做成太太小姐运动,要为了妇女的政治经济教育利益而奋斗。同时女权运动应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同日 高君宇还发表评论《好一个以“至诚之意而谋中国之利益”的新银行团!》,揭露新银行团欺骗中国人民的言词,指出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还向

国人指出现在唯一能帮助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只有“中德俄经济联盟”，号召国人反对新银行团的经济侵略和北洋政府大借款。

11月11日 高君宇撰写《陈炯明与向导周报》，揭露陈炯明在广东扼杀民治运动，帮助英帝国主义侵略南中国的真面目。

12月2日 高君宇撰写《香港通信》。当时《南华晨报》主笔撰文提议组织一种新的军队，交由外国军官统带，北京政府管理，“且是与中国有益的”。高认为，这种意见是帝国主义“立意在实现他们久已计划之‘国际共管中国’”，打倒军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奸险的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帮助我们。

1923年(27岁)

1月31日 高君宇发表《中国人民要与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国主义对德的横暴》一文，谴责法国派兵强占德国鲁尔矿区，要求中国民众、全国工友及一切民间团体应与西方工友们共同反抗法帝国主义的侵略。

2月4日—7日 京汉铁路工人在2月1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后，高君宇曾到长辛店指挥罢工工人与军阀斗争。

2月7日 高君宇为《向导》十九期《一九二二年印度国民运动分析》一文写按语，指出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已经落伍，在军阀和帝国主义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想走类似印度之路是“做梦的努力”。

2月27日 高君宇发表《全国商界的好榜样》，就上

海商界在“二七”期间准备罢市一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可在中国国民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因为全国商人也一样受军阀压迫，所以应当一起行动，为争取共同的自由和打倒共同的敌人而奋斗。

同日 高君宇发表《助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一文。高文指出“二七”惨案发生后，黎元洪指责工人“违法”，要“核办”工人，要制定新法限制工人，处处为军阀辩护，明显表明其政府是军阀的政府，不能再对其有幻想，号召工人要继续流血奋斗。

3月 高君宇和罗章龙、缪伯英、宋天放、何孟雄、刘伯青等秘密隐藏在骑河楼等处，编辑《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以大量事实揭露军阀罪行，显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3月14日 高君宇为《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写跋文《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分析了“二七”罢工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总结“二七”教训得出工人们需要组织政党，而“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他并指出：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努力恢复被破坏的工会，同时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共产党。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内。

4月 少年中国学会举行评议员选举会，李大钊、邓中夏等7人担任评议员，高君宇担任候补评议员。

5月1日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校及民权运动大同盟、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中国学会等联合发起天安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等十余人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会议通过

纪念世界劳动者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胜利；澄清不良政治；解决旅大问题；严惩“二七”残杀工人祸首等议案。

夏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大前，高君宇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提议北方区党委召开区委党员大会，根据共产党国际精神和中央的意见，讨论选派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三大和胡鄂公党籍问题。按照高君宇的意见，北方区委随即召开党员大会，讨论解决上述问题。

夏 高君宇受李大钊的委托，负责联系和管理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是时致信莫斯科中共旅莫支部，通报国内党内要事。

夏 高君宇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

暑假 石评梅随北京女高师暑假旅行团在南方游览，高君宇致信石评梅，鼓励她写好游记。

夏 中共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创刊，高君宇担任编辑。

9月30日 高君宇发表《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认为中国人民要求承认苏联，不单是因为苏联放弃了帝政时代的侵略政策，而是为了与苏联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但政府的态度却令人遗憾，他号召中国人民应“自动与苏俄联合结成反帝国主义同盟。”

10月15日 高君宇致石评梅信，追忆三年前的相识，告知石评梅，《平民》已移北京编辑印刷，定于10月20日复刊，请她投稿。

10月17日 高君宇致信石评梅，就石评梅给《平民》写的一首诗的修改问题交换意见。

11月1日 高君宇亲自主编的《平民》在北京复刊。

复刊《平民》为半月刊，编辑处设在北大和北师大，复刊第一期由高君宇编辑，刊登复刊宣言。称复刊后《平民》仍抱为晋民奋斗之宗旨，注意努力沟通山西和各省人民斗争的联系。

11月9日 高君宇撰写《“赤色帝国主义”么？》一文，强调中苏建立邦交十分重要，中国要独立自由需要寻求国际援助，依靠英美法日不现实，只有苏联可援助我们。

11月25日 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高君宇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委员的还有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4人。

下半年 高君宇担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此期间，他和范鸿劫在北京区主管国民运动。

冬 高君宇与李毓棠介绍傅懋恭（即彭真同志）入党。

12月14日 高君宇居所从静庐移腊库胡同16号。

下半年 高君宇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担任校长室秘书。

1924年(28岁)

1月1日—3月8日 高君宇担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秘书。

1月26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青年俱乐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4团体联合组织开遥祭列宁大会。高君宇参加了遥祭大会，并报告了列宁生平略历，强调追悼列宁要了解列宁主义，指出人们对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和对弱小民族的态度有误解。

遥祭会要求北洋政府承认苏联，决定在中央公园建立列宁纪念碑。

2月初 高君宇接获李大钊信，李信指示他们在处理与北京各团体的矛盾时要适当做出让步。

4月28日 高君宇和石评梅到北京城南公园零坛会见印度诗人泰戈尔。

上半年 高君宇担任北京团教育委员会委员，代理北京团地委书记。

5月21日 张国焘夫妇在北京住所被北洋军警逮捕。时高君宇正在同一院子南屋，巧妙脱险。

5月下旬 高君宇自腊库胡同16号杏坛公寓脱险后，移到苏联大使馆居住。此期间高君宇曾乘火车离开北京，按照中共北方区委的要求，到太原筹建山西党组织和从事山西国共合作工作。高君宇召集侯捷庵、潘恩博到省立一中谈话，介绍侯、潘二人入党，为候补党员，并把在晋党员编为一个小组，由李毓棠任组长，成立了山西最早的党组织。

5月30日 张国焘被捕后，出卖了高君宇和李大钊等北京党员，北洋政府京城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高君宇等归案。山西阎锡山接到此令，严密注意高君宇的活动。

6月前后 高君宇和山西平民中学校长苗培成（苗为国民党中央指派的山西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商谈山西国共合作事宜，议定了一些原则问题，双方派人组成省党部临时筹委会，双方派出人员办公等。不久“国民党山

西省党部临时筹委会”在太原成立，由潘恩博、韩书麟入驻共同办公。

6月5日 高君宇从太原回到静乐峰岭底村家中避难。阎锡山指令静乐县衙暗中监视。高在家住半月，提出与李寒心离婚。

6月20日 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会票选正式举行开箱式，揭示选举结果，正式成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高君宇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总务股主任。

6月22日 高君宇离静乐峰岭底村到达太原。

6月24日 高君宇给岳父李存祥写信，决定和李寒心离婚。

6月下旬 因阎锡山追捕高君宇甚急，而李大钊所交付山西建党任务已经完成，高君宇遂化装火车司机乘车突然离太原赴上海。事后，阎托人转告高君宇，称他是“故纵不捕”。阎也曾指使杨永泰、王怀奇等利用同学关系，高官厚禄引诱，派省议员武植霖以同乡、至交、老前辈身分说情，高君宇始终未上阎锡山的圈套。

夏 党中央派从苏联回国的赵世炎担任北京区委书记，高君宇任宣传部长，范鸿劼任组织部长，彭健华任技术书记，组成北京区委新机构。

8月10日 高君宇发表《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一文，认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右派反动所举起的旗帜是防止国民党共产党化，排斥共产主义者。高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说，国民党之所以要这样，是借此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使国民党成为“私人利益集合”的政党。

9月10日 高君宇发表《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

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之所以支持某军阀战争，无非是想借助所支持军阀的胜利发展，造成他们在华更优越的地位。所以，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是中国的祸害，只有组织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把他们推翻才能“自救”。

9月22日 高君宇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给石评梅写信，告诉石评梅：“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9月25日前后 高君宇到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10月10日 广州买办陈廉伯组织的商团军发动叛乱，阴谋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高君宇积极帮助孙中山组织工团军，平定商团叛乱。高君宇在指挥战斗中，敌弹击破车窗，弹由胸侧而过，险遭不测。

11月13日 高君宇随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此行乃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赴北京商谈国事。

11月下旬 高君宇先期回到北京。返京后血管破裂，遂送到德国医院住院治疗。党组织安排其胞弟高全德陪侍。

12月 李大钊召集高君宇、赵世炎、彭桂生及铁总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高君宇未到会。

1925年(29岁)

1月1日 高君宇仍在德国医院治病，石评梅前往探视。

1月上旬 高君宇出院，移住苏联大使馆。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以北京代表的身分到沪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工农运动和青年妇女工作，认识到确立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会议期间，高君宇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交谈甚洽。

1月25日前后 高君宇在天津面访邓颖超，并转交周恩来在上海四大期间托付转交邓颖超的一封信。邓颖超对高君宇印象深刻，认为高温和、沉着，内心蕴藏革命热情。

1月28日 高君宇和石评梅游陶然亭。

3月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高君宇出席会议，并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了由30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会议结束后，200余名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3月2日 高君宇忽感腹痛，但他并未介意，仍带病坚持工作。

3月4日 高君宇给石评梅写信，未寄出；又给兰辛、焦菊隐等写信，亦未寄出。

同日 高君宇腹痛不能支持，由北京区委兰辛陪送到协和医院治疗，经诊断为急性盲肠炎。院方决定手术治疗。

3月5日 高君宇因盲肠炎手术医治无效，于是日2时40分在医院去世。

3月14日 《向导》刊登《悼我们的战士》，报导高君宇去世消息。

3月29日 中共北京区委会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

代表大会、北京大学、《政治生活》社、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友会的名义举行高君宇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王若飞等送花圈挽联、赵世炎主持追悼会，邓颖超、张叔平参加追悼会，石评梅送挽联、挽词。大会悬高君宇遗像，题词说，高君宇同志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青年革命健将，从事革命不遗余力，二七罢工、商团之战几遇险。

5月8日 高君宇遗体安葬陶然亭。安葬事宜系根据高君宇遗愿，石评梅提议，经党组织同意办理的。为避免军阀干涉，丧事以高全德和石评梅的名义安排。墓地买价和各项开支由党组织负担。墓志铭撰写由党组织安排和审查，以高全德名义刊刻。墓碑上刻有石评梅亲笔书写的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知青日记选编》、《知青书信选编》 的史料价值

史 卫 民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发生在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运动曾牵动了上千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知青的书信和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是一代人历史的生动再现。岁月流逝，几经沧桑之后保留下来的知青日记和书信，就更显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96 年 8 月出版的《知青日记选编》和《知青书信选编》，就是对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现就这批知青日记、书信的史料价值做一简单介绍。

知青日记和书信是从黑龙江兵团、内蒙古兵团、内蒙古、陕西、山西、江苏等省插队知青近百人中征集到的 30 余本和近千页日记复印件，从征集到的 500 余封书信中，以及当年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书信、日记中精选而成。其中日记 396 篇，共计 28 万字。书信 148 封，共计 29 万字；日记、书信的时间以 1968 至 1979 年为限。

知青日记和书信作为一批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史料，其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

从1968年到1978年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知青日记、书信中都有明确的记录,试举几例:

1968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并爆发了边界冲突,国内战备空气日浓。在这两年的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古兵团知青的日记、书信中,都有大量关于战备的内容,包括武装连的编组、军事训练和紧急集合等情况。尤其是黑龙江兵团知青之君的信,详细介绍了与苏联仅一江之隔的三师二十二团(饶河)在“珍宝岛”事件前后的备战情况。1969年10月19日林彪发出的战备“第一号命令”的具体内容和在此前后的“敌情通报”,在内蒙古兵团和黑龙江兵团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插队的知青,也记下了不同地区农村的备战情况。从这些日记、书信中,不难看出当时青年人确实具有为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热情和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清理阶级队伍”、“开门整风”、“一打三反”等运动,都成为知识青年关心的事情。他们写下了各地运动发展的情况,并大量涉及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运动的情况。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很多地区曾一度成为政治运动的主力,去批判和改造他人,不少知青是带着矛盾心理参加这些运动的,在他们的日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知青们在日记、书信中为其大喝其彩,并预言中国人完全可能也肯定能到月亮、金星、火星上去。甚至有人声

称要当宇航员，“到宇宙转一遭死了也甘心”。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给知识青年以极大震动。他们先是在信中偷偷交流“关系人头落地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的各种信息，随即在学习中央文件后记下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人把中发77号文件和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全文抄录在日记本上。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知识青年们更多的是记下了自己对国家形势的分析和看法。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知识青年的哀痛溢于言表。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多知识青年采取的是漠视的态度。打倒“四人帮”，他们由衷地表示高兴。这一年的日记和书信中，不乏这方面的内容。

关心国家大事，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普遍特征。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所以当年的日记和书信中，总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日记、书信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提供了来自民间的宝贵资料。

（二）知青生活的真实再现

在日记和书信中，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由于所在地区和安置方式不同，差别较大，但是我们注意到，当时知青普遍描述的无非是以下11个方面的内容：

- （1）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
- （2）居住条件（包括必备生活用具和服装等）。
- （3）作息时间。
- （4）劳动生产情况（包括科学实验等）。

- (5)学习和政治运动。
- (6)伙食问题。
- (7)收入和支出。
- (8)文化活动。
- (9)知识青年的恋爱与婚姻。
- (10)知青小集体的情况。
- (11)改变农村的医疗、教育等落后面貌。

下面就这11个方面的内容做些简单的说明。

离开城市后,知青们以新鲜的眼光打量即将安身的地方,自然要从各方面将其与城市做一番比较,并将基本情况迅速通报给亲友。他们在陈述自然环境时,往往亦描绘一下所在地的“阶级阵线”,这当然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居住条件差是各地知青普遍面临的问题,如陕西插队知青马松涛,在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取水的困难和打柴的艰辛;黑龙江兵团的黄正建,则在向亲友的信中陈述了连队不断搬家所造成的住房困难。对居住条件和生活必需品的细致记述,为研究知青的生活待遇提供了准确的实证。

作息时间表是生活节奏的反映,在这批日记和书信中,既可看到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的军事化生活的作息表,也可看到陕西农村插队知青的作息时间和作息计划。把作息时间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兵团和插队生活节奏的明显不同。

第一次劳动,往往给知青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记和书信中,不乏对第一次劳动情景的追述,并多多少少加

上自己的感想。此后高强度的劳动越来越多,知青们逐渐习以为常,记述劳动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少;反之,对科学实验和农业知识、农机知识的学习等,有了较多的记载。当然,大规模的“会战”,如兴修水利工程、开“大寨田”、雨季抢收麦子等,还是留下了不少记载。生产建设兵团的机械化生产和农村社队的手工劳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批日记、书信中提供了不少生产数字,为研究这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实证。

如前所述,知青日记和书信曾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除了关心国家大事外,知青本身的学习理论和提高思想觉悟亦是重要的内容,在日记中显得尤为突出。1968—1971年的日记里,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多,甚至有些日记完全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总结。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保留了一些学习心得和思想总结,意在真实反映当时的政治背景和青年人的学习方式、思想方法。1971年以后,学习心得和思想总结之类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少了,代之以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其他知识的学习,有关这些方面的记述,我们一般都加以选用。此外,共青团的工作和争取入党的知青的思想活动,在书信、日记中也有大量的反映。

伙食问题,在插队知青中间往往引发矛盾。矛盾的焦点,一是分吃还是合吃,二是由谁来做?作为一个知青集体,一开始往往是合在一起吃饭,由知青轮流做饭或指定一名知青专门做饭,其他知青将其劳动包下来,也有专门请老乡做饭的。但是男女知青劳动强度不同,饭量大小不一,或因为粮食不够,或因为谁多吃谁少吃,难免发生争吵乃至“分家”。陕西插队的知青,在交流管理教育经验

时,就曾讨论过“办集体灶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专司做饭的知青,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如被大家推选做饭的陕西插队女知青王晓平,就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五怕”的思想:一怕做不好,同学有意见;二怕又热又熏,又脏又麻烦;三怕粮食亏了负责任;四怕外出休息不方便;五怕学不到农业生产技术。自告奋勇做了一年饭的陕西插队知青刘勇,亦有同感,在日记中大诉其苦,并在一年后坚决辞掉了做饭的工作。

无论是兵团知青,还是插队知青,在“思想革命化”的同时,都没有忽视收入问题,因为这是根本经济利益所在。兵团知青有供给制和工资制的不同,但标准都是国家定的,知青不需操太多心。插队知青的“分红”多少,就大有学问了。当时普遍推行“大寨评工法”,在记分时常会产生不满,甚至进而引起知青中的矛盾和摩擦。在马松涛和内蒙古插队知青康星沙等人的日记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支出情况,或向父母汇报,或者自己一笔笔记下来,做到心中有数。这些数字虽然枯燥,但从中看到的是不同地区知青的经济状况,对研究者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知识青年曾努力在农村、兵团营造新的文化氛围,如开展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出板报,读书,等等,但总的说来知青的文化生活并不令人满意,在日记和书信中经常能看到抱怨之词。

为真实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的恋爱和婚姻问题,知青书信不仅收录了197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在河南延津县插队的知识青年的《为革命大力提倡晚婚》的公开信,

还提供了一些实例，如知青怎样看待自己的婚事问题，如何对待农村保媒人的活动和来自各方面的议论，知青结婚后遇到的生活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知青恋人的“两地书”，在相互关心和思想交流中，蕴含着年轻人的纯真爱情。

不管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到农村插队，都会遇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在插队知青中，尤为突出的是“知青集体”的利益和团结问题。影响团结的因素，既有生活方面的，如吃粮、吃菜、烧柴等具体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集中表现为男女知青如何记工和分配；还有政治方面的，在面临入党、提干和推选知青先进人物问题时，总不免产生一些矛盾。这类问题，在日记中反映得最多。刘勇干脆指出：知青小组从兴起、强盛到衰落、消亡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周期可在1—2年之间。通观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总结不无道理。

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和教育落后的状况，始终被视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农村的贡献。在陕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婉佳、符晓平等，曾当过农村的“赤脚医生”，她们记下了在农村“行医”的足迹。黑龙江兵团的女知青许秀婷，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卫生员，靠了《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祖国医学宝库》和《黑龙江中草药手册》中的验方，居然将一个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中年妇女治好了，她怀着兴奋的心情向远在首都的母亲报喜。担任学校教员的知识青年，不但从学生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还在教学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黑龙江兵团知青王奇等人的日记，提供了大量的实证。

(三)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

在这批日记、书信中,涉及到了一些知青典型人物和优秀事迹,如金训华、孙立哲和黄山茶林场 11 名上海知青的事迹等。不少知青表示要学习他们的优秀事迹,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可见宣传这些典型人物和事迹对推动运动发展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

除了比较出名的知青典型外,还收录了两个知青烈士的遗书。一个是北京四中 67 届高中毕业生张育海,1968 年 10 月到云南插队,1969 年 3 月参加缅共人民军,1969 年夏季牺牲。他在牺牲前写给同学的信中郑重地告诉同学:要珍惜和平和幸福,不要以玫瑰色的眼光看待战争,不要冒失地做出出国参战的决定。另一个是呼和浩特二中 68 届初中毕业生力丁,1971 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2 年 5 月在草原大火中牺牲。她在生前写给同学的几封信中,描述了一个“黑帮子女”在特殊政治环境中的苦恼,并表达了自己逆境中争取上进的心愿。

(四)有关“知青政策”的诸方面问题

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费使用、知青病困退、迫害知识青年案件的处理等,都是当时“知青政策”中重点涉及的问题,在这批日记、书信中亦有不少的资料。

山西插队知青黄宝建在家信中曾对 1968 年的 240 元知青安家费的具体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这样的来自基层的最直接的数字,并不多见,所以很有价值。

在日记和书信中各提供了一个黑龙江兵团知青病退的实例。知青康成杰在日记里记述了帮助患癌症的知青办病退手续时遇到的各种非难,他最后气愤地写道:一个

人患癌症，奄奄待毙，而这里的先生们竟一点反应无有，他们还有良心吗？另一位知青则写信给同连患病回京治疗知青的家长，介绍病退需办的各种手续。

《知青书信选编》中收录的知识青年和知青家长的上访信，更集中地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如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时的“走后门”现象，知青生活困难，医疗等问题没有解决，生活和思想教育无人过问，甚至被干部打骂，女知青被奸污迫害，多子女下乡后城市中父母无人照顾，等等，远比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上书涉及的面广，问题要严重得多。研究这些书信，可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负面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

（五）知识青年的文学创作

在一些日记、书信中，保留了当年知青创作的诗歌、特写，我们摘收了近20则。山西插队知青燕陵生的打油诗《这可怎么办》、《不平多》和《返村有感》，马松涛的《心愿》，内蒙古插队知青万忆婕的《晨曲》、《病魔》，江苏插队的南京知青薛兵的《平凡人的诗》，等等，从不同角度用文学手法展现了知青的生活并揭示了知青的内心世界。

不少知识青年有在笔记本上抄录名诗、歌曲的习惯，《知青日记选编》中录用了几首当年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抄的诗，如《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请缨歌》和《理想之歌》等，因为这些诗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六）知识青年当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与思索

在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之前，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前往农村插队落户。先行者的激情，在1968年7—12月的日记和

书信中有充分的展露，很多人都做了在农村、边疆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带着激情走的人依然不在少数，从1969年的日记、书信中继续可以看到知青热情洋溢的决心。但是在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下来之后，知识青年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才真正开始，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试图找出答案。引起广泛注意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对“再教育”的说法如何理解？“再教育”是不是等于“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2)如何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怎样看待农村的落后状况？知识青年怎样才能大有作为？

(3)知识青年在社会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怎样看待知识青年的分化问题？

在多数知青的日记中，都有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理性思考。不同的答案，导致了不同的实践。为了深刻认识上山下乡问题，有人曾在1970年夏季准备总结一份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并想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将这份报告寄给毛主席。还有人把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视为“在朝派”，把插队知青当作“在野派”，想探讨“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区别。1976年，更因《北京日报》发表《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公开展示了“扎根派”与“动摇派”之间的争论。这批日记、书信提供的大量议论，反映出形形色色的观点，很带有普遍意义。

然而，对千余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说，现在选编的

这几百篇日记、书信毕竟是太少了。日记、书信的征集面也不宽，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江苏五个地区，缺少其他地区的资料。尽管如此，它们仍不失为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文化大革命”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它们的出版，为今后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知青日记、书信等史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更 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章学新同志来信指出,《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一文中说,1942年6月8日全党整风展开后,“中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也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是高岗他们搞的,也是‘左’的很……”两处史实有误。经查,事实是,1942年5月21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由于我们工作疏忽,造成以上纰漏。特向读者致歉,并引为今后工作鉴戒。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九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